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人文学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扩展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奚爱国 冯 泉 常本春 余 珽
袁建华 高 健 孙 丽 郭东升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步健
副主任 陈 锋 朱 杰 夏 涛 钱照亮
魏晓蕾

编 委 (按笔画为序)

韦 敏 李 业 李 军 吴元庆
张吉林 张思东 陈 思 龚万达
潘庆磊

主 编 朱 杰

副主编 陈 思

目 录

2024年 第4期 总第150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吉 强
责任编辑:蒋建忠 鲍跃华 王天海 宋 好

统战理论与实践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研究

——基于全国百强县宜兴的调查 / 张伟伟 何 璐 4

“四链”同构促进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效能提升研究 / 李 腾 14

中华文化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论意蕴 / 徐建飞 21

延安《解放日报》“民主建政”话语构建及其历史经验研究 / 徐岑琛 崔雪林 27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品格与理论特质 / 王 超 冯亚辉 35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 年 8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共同富裕演进路向 / 殷一博 高秋茹 43
-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互动关系研究 / 张彩云 52
-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保障与改善民生的价值理念、本质要求与实践进路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重要论述的文本分析 / 师 洋 陈 思 61

学习与思考

- 高校思政课教学媒介变迁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 王志强 70
- 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对象化理论的批判与超越——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 / 单 璐 76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0 * 2024 - 04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政治参与研究

——基于全国百强县宜兴的调查

张伟伟 何璐

摘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参与主体。县域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本研究以中国百强县宜兴市为案例,从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出发,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的态度、实践类型和影响进行考察,剖析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参与;百强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明确“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既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如何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强化他们的政治认同,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本研究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参与,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态度和政治参与类型进行考察,然后从民主选举、

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五个环节考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并由此提出对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综述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重要论述。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收稿日期:2024-07-14

作者简介:张伟伟,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络与新媒体系副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江苏网络人士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社会分层、网络统战;何璐,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网络人士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群体政治引领研究”(ZK2023028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概念内涵、价值作用和实践路径三个方面展开。

学界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主要基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出发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了概念阐释。肖立辉梳理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指出“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是理论前提,“人民对包括民主在内的美好生活的需求”是逻辑起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核心要义,“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必然要求^[1]。在实践层面,董树彬对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探索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进行了梳理总结,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突出强调了人民属性、人民立场、人民至上的人民逻辑,进一步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2]。刘建军、张远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包括了表达过程中的民主、协商过程中的民主、征询过程中的民主、决策过程中的民主、评价过程中的民主^[3]。

在价值作用方面,学界关注全过程人民民主对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势与功能作用。一些学者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民主新形态,比其他民主模式更具有价值优势。刘焕明、高雅琛认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侧重程序民主,将民主的关注放在程序上,表面服务于人民而实际上服务于资产阶级,而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动态运转^[4]。有的研究关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现人民利益、助力国家治理等方面的作用。樊鹏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是能够有效维护人民广泛真实权利、巩固和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追求社会和谐稳定与社会活力相统一的民主^[5]。董树彬、何建春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赋能国家治理,通过民意与法治的良性

互动实现融合化治理,通过价值与工具的弹性整合实现整体化治理,通过程序与实效的规则创设实现规范化治理,通过民主与集中的双轮驱动实现科学化治理^[6]。

在相关实践的研究中,学者主要从制度设计、运行模式、技术手段等方面进行考察。在制度设计上,学者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代表大会、依法治国、社会主义经济等方面进行探讨。张明军、李天云认为,党性、人民性、法治性的有机统一构筑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整体性架构,协商民主和基层民主奠定其成长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开辟了践行渠道,政策民主和民生政治参与构成战略突破口^[7]。在实践模式上,李笑宇分析四个主要运行机制,包括了价值引领机制、联动协商机制、吸纳整合机制与环节贯通机制^[8]。张力伟、李璿璐通过对基层运作过程进行考察,探讨了“三全合一”的运作模式,即全方位动员、全体系架构和全流程监督合一^[9]。在技术手段上,学者关注新兴数字技术与民主实践的结合。谢加书、王宇星将数字技术融入增效路径,探索数字政协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增效路径^[10]。高奇琦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集中地表现为全局性利益、全面性制度、全程性过程和全民性参与,数字技术能够使公众更便捷和低成本地进行政治参与,有助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落实^[11]。

(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研究综述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的经典课题。胡荣对“政治参与”的定义进行梳理,指出政治参与的内涵从选举投票扩展为一切民众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利益以及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的行为^[12]。2015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强调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目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已接近1亿人,普遍具有较高学历和

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及技能，是重要的政治参与主体^[13]。

学者从线上和线下两个维度探讨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行为。对于线下传统政治参与，学界主要考察参与渠道和参与程度。朱建刚发现，新的社会阶层青年群体政治参与水平总体较低，主要通过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侨联、台联、青联、工商联等组织的座谈会、协商会等方式进行政治参与^[14]。张卫指出，大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会参与非正式的自组织，这些自组织发挥着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履行社会责任、有序政治参与的作用^[15]。关于线上网络参政，相关研究包括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等。在参与行为方面，张卫、后梦婷、张春龙调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网络行为时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热衷在微信、QQ、微博、论坛等网络平台上关注国家政策和社民生，积极参与政治，而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容易形成“小圈子”，在线上对圈子内群体主要依靠网上动员，同时也会以集体的名义对外进行网络发声^[16]。在影响因素方面，张伟伟、王娜对江苏地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调查，发现政治认同、媒介依赖是影响网络参政的重要因素，认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网络参政更多受主观政治理念（政治体制和执政党）的激发，而且对媒介依赖的程度越深，尤其是对互联网依赖的程度越深，他们网络参政的程度也越深^[17]。李昂泽、张伟伟在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调查中发现，收入水平、广播依赖、电视依赖、网络信任等会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影响，并且他们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能够显著促进网络政治表达和交流^[18]。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价值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是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客观需要。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广泛体现人民意志、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真实保障人民权益、有效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依靠人民

主体参与，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大多数是体制外知识分子。根据“两阶级一阶层”的传统政治分层，他们与工人、农民、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利益是一致的，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从工作实践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四类群体在满足群众意愿、维护群众权益、推动群众参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满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诉求、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重要内容。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在党外、体制外，他们缺少体制保障，普遍缺乏稳定的组织关怀，这导致他们归属感弱。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合理、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提升其主人翁意识，增强他们的政治认同。现实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加强，这反映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覆盖的民主，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覆盖国家治理的各环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在各自的职业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这些特征使得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较高的公共决策研究能力。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围绕党和政府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事关人民群众切实利益的民生问题以及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等展开讨论，形成政策建议，有利于以高质量、高效能的民主实践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律师群体对社会各领域的法律法规较为熟悉，他们通过全过程

人民民主参与法律规范体系建设,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法治化过程,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智慧。

三、研究设计

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江苏省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聚集地之一。宜兴市是全国经济百强县、江苏省经济十强县。近年来,宜兴市认真贯彻落实“组织起来、加强引导、发挥作用”的根本要求,扎实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相继组织成立新联会、网联会,紧密团结一批政治坚定、素质优良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作出有益探索。本研究以宜兴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调查对象,对他们的群体基本特征、思想政治状况和政治活动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宜兴市委统战部组织开展调研工作,共回收问卷149份,深度访谈11名代表性人士,并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生活的重点场所进行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的研判。

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现状

本研究从政治参与态度、政治参与实践和政治参与影响三个方面考察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现状。具体而言,从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动机两个方面考察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态度,并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五个环节对

不同类群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实践进行调查。同时,考察了政治参与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认同(执政认同)和责任担当意识的影响。

(一) 政治参与态度:高热情、多动机

政治效能感是个人认为其政治行为对政治体系和政府决策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觉或信念,可用于判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政治参与的态度。调研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普遍具有较高的政治效能感(总体均值为3.50),其中,“我非常关心本地政府的各项政策”(均值为3.65)和“我对政治和公共事务很有兴趣”(均值为3.58)两个题项得分最高(见图1),显示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很高的参政议政热情。这说明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已经感知到政治参与和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希望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他们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推动自身更好发展。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动机可以分为三种(见图2):一是“实现自身价值”,即“想向他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均值为3.09);二是“利益”,包括自身利益(均值为2.72)和他人利益(均值为2.64);三是“娱乐”,即“无聊时打发时间”(均值为2.37)。三种动机中,“实现自身价值”得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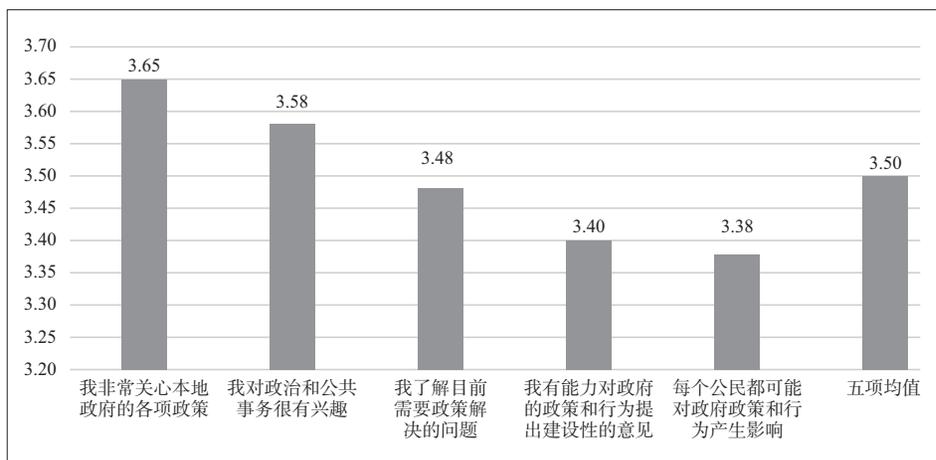


图1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效能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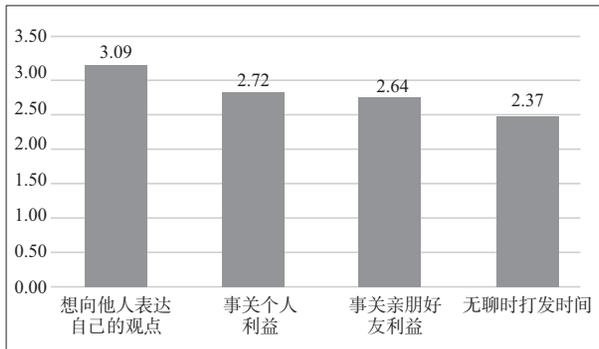


图 2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动机

最高，说明这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的主要动机。从类型来看，“实现自身价值”属于社会性动机，该动机反映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构社会身份、寻求社会认同的心理。不难看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期待自身的社会属性和“建设者”的定位获得社会认同。另外，受利益驱动进行政治参与反映出，虽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目前尚未形成自觉的、统一的政治诉求，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政治上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逐渐开始注重将自身关心的经济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诉求。

(二) 政治参与实践：“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均有一定程度的参与

1. 民主选举

人民通过选举、投票，选出代表自己意愿的人来掌握并行使权力，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在我国，选举是广泛的，有国家机构选举、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选举、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等。在宜兴这一县级城市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接触的是基层选举。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和居民委员会选举是我国重要的制度化民主选举方式。本研究考察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加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和居民委员会选举的情况。调查发现，该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基层民主选举的比例并不高。对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仅

13.4% 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经常”参与，而高达 31.5% 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从不”参与（见表 1）。对于居民委员会选举，仅 12.1% 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经常”参与，“从不”“很少”和“偶尔”参与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占比分别达 28.2%、21.5% 和 25.5%（见表 2）。

表 1 参加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状况

参加基层人大代表选举频率	百分比
从不	31.5%
很少	16.8%
偶尔	22.8%
有时	15.5%
经常	13.4%

表 2 参加居民委员会选举状况

参加居民委员会选举频率	百分比
从不	28.2%
很少	21.5%
偶尔	25.5%
有时	12.7%
经常	12.1%

2. 民主协商

民主协商是指人民在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的同时，在重大决策前和决策过程中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在现实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可以通过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评估、咨询、民意调查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就政治、经济、社会等重大问题以及事关自身利益的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中开展广泛协商。本研究考察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线上和线下参与民主协商的情况。调查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线下参与民主协商的程度要高于线上。13.4% 和 34.9% 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经常”和“有时”参与线下民主协商，38.3% 的“偶尔”

参与线下民主协商，三者合计占比为 86.6%，说明近九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过线下民主协商（见表 3）。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经常”“有时”和“偶尔”参与线上民主协商的比例分别是 8.1%、19.5% 和 31.5%，三者合计占比为 59.1%，说明约六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过线上民主协商（见表 4）。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线下和线上民主协商的参与差异与我国目前民主协商渠道主要为线下相关。

表 3 线下参与民主协商状况

线下参与民主协商频率	百分比
从不	4.7%
很少	8.7%
偶尔	38.3%
有时	34.9%
经常	13.4%

表 4 线上参与民主协商状况

线上参与民主协商频率	百分比
从不	24.8%
很少	16.1%
偶尔	31.5%
有时	19.5%
经常	8.1%

3. 民主决策

民主决策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一环，主要体现为人大“开门立法”、政府“开门问策”、广大群众参与基层决策等。在实践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可以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直接参与法律草案的起草、立法调研、修改论证、立法后评估等各个环节。此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还可以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听证会等方式参与讨论政府即将实施的重大决策。本研究考察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线上和线下参与民主决策的情况。调查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参与民主决策的频率都不高。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线下民主决策方面，“从不”占 20.1%，“很少”占 24.8%，两者合计达 44.9%（见表 5）。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线上民主决策方面，“从不”占 38.9%，“很少”占 18.1%，两者合计达 57.0%（见表 6）。

表 5 线下参与民主决策状况

线下参与民主决策频率	百分比
从不	20.1%
很少	24.8%
偶尔	26.2%
有时	20.8%
经常	8.1%

表 6 线上参与民主决策状况

线上参与民主决策频率	百分比
从不	38.9%
很少	18.1%
偶尔	22.1%
有时	14.1%
经常	6.8%

4. 民主管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让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其中，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是人民以组织化方式参与民主管理的重要渠道，这些组织在行业自律、社会服务、慈善事业等领域发挥民主管理作用。对于如何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引导其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有一个好办法，就是组织起来。”本研究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社团或组织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情况。调查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加入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团体或组织的频率并不高。其中，“经常”和“有时”加入的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分别占 9.4% 和 18.8% (见表 7)。这表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仅有一定程度的社团组织参与意愿。

表 7 加入有关社会公共事务团体或组织状况

加入团体或组织频率	百分比
从不	31.5%
很少	12.1%
偶尔	28.2%
有时	18.8%
经常	9.4%

5. 民主监督

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广大人民群众和各个监督主体全方位、不间断地参与监督的渠道和机制。我国民主监督包括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监察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在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新媒体从业人员作为多元信息第一时间接触者,对重大事件的发声有知悉判断作用,对关键信息有解读阐释作用,对网络意见领袖的言论有推动或制约作用,他们对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极为熟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其他群体的思想价值观念易受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影响,在舆论形成中与其形成共振。基于此,本研究考察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舆论监督的情况,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一定的舆论监督参与度。其中,“经常”和“有时”进行舆论监督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别占 9.4% 和 18.1% (见表 8)。

表 8 参与舆论监督状况

向新闻媒体反映意见频率	百分比
从不	20.1%
很少	24.8%
偶尔	27.6%
有时	18.1%
经常	9.4%

(三) 政治参与的影响:提升执政认同和自觉担当意识

本研究从政府和个体两个维度来考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的影响。在政府维度,考察了政治参与如何影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政府的执政认同。在个人维度,考察了政治参与如何影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自觉担当意识。

调查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五个环节都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执政认同产生正积极影响(见表 9)。根据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显示,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都能显著提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政府在收入分配、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和司法保障这四个方面执政评价。换言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越多地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他们就越能够认可政府在收入分配、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和司法保障方面的执政表现。其中,相较于其他政治参与实践,民主选举提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执政认同的作用最强。这表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民主选举的机会越多,越能加深对政府执政行为的理解,从而提升对政府执政表现的满意度。

表 9 政治参与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执政认同影响

变量	收入分配	公共医疗	社会保障	司法执法
民主选举	.433**	.333**	.317**	.292**
民主协商	.287**	.329**	.299**	.301**
民主管理	.323**	.279**	.199*	.178*
民主决策	.288**	.242**	.161*	.132
民主监督	.275**	.276**	.201*	.209*

注: p 值 <.05, 相关性显著, 显示为 *; p 值 <.01, 相关性显著, 显示为 **; p 值 <.001, 相关性显著, 显示为 ***。

调查发现,民主选举、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对提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觉担当意识有着正面的积极影响(见表 10)。换言之,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越多地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他们就越容易产生维护国家利益、弘扬传统文化、履行阶层使命与责任、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的自觉担当意识。其中，相较于其他政治参与实践，民主协商对提升他们自觉担当意识的作用最强。这表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民主协商的机会越多，越能促进自身的阶层认知和责任自觉，增强履行好社会角色和社会使命的担当意识。

表 10 政治参与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觉担当的影响

变量	维护国家利益	弘扬传统文化	使命感、责任感	社会服务活动
民主选举	.172*	.169*	.182*	.199*
民主协商	.264**	.241**	.268**	.257**
民主管理	.100	.132	.143	.143
民主决策	.085	.075	.091	.116
民主监督	.167*	.148	.179*	.179*

注：p 值 < .05，相关性显著，显示为 *；p 值 < .01，相关性显著，显示为 **；p 值 < .001，相关性显著，显示为 ***。

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参与主体存在的问题

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已经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并且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从调查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态度积极，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效能感和多元化的政治参与动机，他们对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他们的政治参与实践提升了他们对政府执政表现的认可，也提升了他们的阶层责任担当意识。

但调查也显示，部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将政治参与和自身利益挂钩，求生存、求发展是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动机，这使得他们政治参与的成效不够理想。在访谈中，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流露出只想获得一些政治荣誉，以此来提升自己

的政治资本，从而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部分受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获得一定政治安排后，并没有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发挥应有的作用。总体而言，作为政治参与主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自觉性、政治素养、参政目标和社会责任感都需要进一步提高。

（二）政治参与渠道存在的问题

从现实情况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具有一定经济社会地位的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更有影响力，其政治态度和社会心态往往对舆论有重要影响，所以党委也高度重视他们的政治发展状况，不断强调要加强对他们的统战工作。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群体人数的扩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本身的政治参与意愿也越来越强烈。但从调查结果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的渠道比较狭窄。目前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虽然都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五个环节，但整体而言，他们的参与程度并不高。在民主选举和民主协商方面，目前人大、政协、民主党派会吸纳新的社会阶层代表性人士，但其所占比例比较低，难以完全满足他们的参政诉求。在民主决策方面，政府先后建立了行政咨询制度、政务公开制度以及行政复议制度，对于那些影响广泛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政府也会在较大范围内发动社会成员参与其中。但是，由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我国出现较晚，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过程中一般不会广泛深入地邀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民主决策。在民主管理方面，调查显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程度不高，通过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频次并不多。在民主监督方面，调查显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比较擅长的舆论监督领域参与程度并不算高。这些都表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整体政治参与程度不高，较少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身的利益和诉求，也并未发挥自身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应有作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需要建立畅通的渠道，否则不能很好地、充分地满足他们政治参与的意

愿和诉求。

六、完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政治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调查发现，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参与动机是为了获取个人利益，少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于政治参与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将政治参与作为个人获利的途径，部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还有非理性参政的行为。因此，需要通过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政治引领，提升他们的政治素养，让他们的参政议政合法合规，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相应贡献。在此过程中，要注重多采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培训，扎实提升他们的政治理论素养和参政议政能力。

（二）拓宽政治参与渠道

一方面，将政治表现和自身影响相结合，推荐那些政治立场坚定，有水平有影响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各类特约人员，畅通他们的体制内政治参与渠道。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方面的社会化渠道和互联网渠道。例如，可以通过座谈会、咨询会、研讨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吸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政策制定，发挥他们在各自领域的专业强项。还应谋求建立完善的社会协商对话平台，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普通民众的联系，让他们成为走好群众路线的重要力量。

（三）强化组织吸纳

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以下简称“联谊组织”）的统战功能，通过联谊组织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合法参政、有序参政、理性参政。此外，赋予涉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组织更多统战属性，通过这些组织做好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政治参与引导工作。推荐更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入群团组织任职或兼职，发挥他们在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务、社会事务等方面的作用。将有影响力的“自组织”作为关注重点，加强规范化建设，提升内部治理科学化水平，不断增强其内生动力和组织活力，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发挥他们在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的价值和功能。

（四）开拓线上民主协商渠道

从调查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民主协商的途径集中在线下。但线下传统参政渠道较少，难以满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诉求。未来统战部门可以切实开拓线上民主协商渠道，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网络民主协商提供便利。例如，统战部门可以通过开设协商论坛、成立网络社团等方式，与大型社交平台、热门论坛、网络社区开展合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搭建民主协商平台，使得他们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就公共事务进行沟通交流，激发他们参与民主协商的热情。

（五）推动电子政务建设，消除信息不对称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深度和广度密切相关。在具体政治参与实践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政府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会直接影响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深度和广度。因此，统战部门可以通过党政联席会议等部门协调机制，推动包括网络统战在内的电子政务建设，逐步消除政府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加快整合各类政府信息平台，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能够及时掌握公共事务的动向，为他们参政议政提供充分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积极优化政府业务流程，进一步明确政府业务流程各环节的工作任务、目标要求、标准制定等，充分满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知情权，提升他们参政议政的有效性和有序性。

参考文献:

- [1] 肖立辉.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与体系框架[J]. 人民论坛, 2022(1): 57-62.
- [2] 董树彬. 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与本质要求[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2): 1-11.
- [3] 刘建军, 张远.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J]. 社会政策研究, 2021(4): 95-106.
- [4] 刘焕明, 高雅琛. 全过程人民民主: 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统一[J]. 理论探讨, 2024(2): 56-62.
- [5] 樊鹏. 全过程人民民主: 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J]. 政治学研究, 2021(4): 3-10.
- [6] 董树彬, 何建春.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国家治理: 现实可能、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J]. 学习与实践, 2022(2): 24-34.
- [7] 张明军, 李天云. 构建新型现代民主: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J]. 社会科学, 2023(10): 91-101.
- [8] 李笑宇. 全过程人民民主: 运行机制与显著优势[J]. 科学社会主义, 2021(5): 116-123.
- [9] 张力伟, 李瓔珞. “三全合一”: 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模式及其内在机理——基于Q社区的实践分析[J]. 探索, 2022(6): 62-72.
- [10] 谢加书, 王宇星. 数字政协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比较优势、逻辑机理与增效路径[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2): 22-29.
- [11] 高奇琦. 数字技术如何支持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落实[J]. 政治学研究, 2022(6): 63-74.
- [12] 胡荣.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J]. 社会学研究, 2008(5): 142-159.
- [13] 中国“新的社会阶层”已近1亿人 其中超六成有高等学历[EB/OL].(2023-05-2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6906147943904633&wfr=spider&for=pc>.
- [14] 朱健刚. 新职业转正与新阶层青年的社会参与[J]. 人民论坛, 2020(35): 106-109.
- [15] 张卫. 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 必然、应然与实然[J]. 江海学刊, 2022(1): 125-133.
- [16] 张卫, 后梦婷, 张春龙.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网络行为特征及统战工作方式研究[J]. 江海学刊, 2019(2): 125-131.
- [17] 张伟伟, 王娜. 新社会阶层的网络参政及影响因素研究——一项基于江苏地区的调查[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4): 39-43.
- [18] 李昂泽, 张伟伟. 社会治理背景下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及影响因素——一项基于江苏地区的实证调查[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4): 40-47.

责任编辑: 吉强

“四链”同构促进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效能提升研究

李 腾

摘要:随着新经济新业态加速发展,以及新生代群体职业价值观的转变,自由职业人员不仅规模激增,而且群体特征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面临着思想引领实效性不高、组织化水平较低、高水平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较难和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工作困境。需要从工作思路、工作场域、工作内容、资源配置四个方面进行系统变革,通过数字链、供应链、利益链和价值链“四链”同构,多维提升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效能。

关键词:自由职业人员;系统变革;四链同构;统战工作

作为新的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职业人员在增加就业机会、缓和社会矛盾、推动共同富裕和促进精神文明繁荣方面都起着积极作用。做好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事关经济社会发展,也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群众基础,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1]。然而,相比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其他群体,这一群体的统战工作起步较晚,探索较少,亟待进一步总结规律,弥补短板,突破盲区,提升工作的科学性。本研究基于浙江统战工作实践及自由职业人员的调查,针对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须破解的难题,探讨有效的应对之策。

一、自由职业人员的群体特征

(一) 群体特点变化

自由职业人员是指不与用人单位建立长期固定的劳动关系,以个体职业为主要形式,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和专长,为社会提供专业服务并获取劳动报酬的人员。他们主要分布在文化和经济两个领域,包括自由撰稿人、网络作家、编剧、自由教育职业人员、自由科技信息人员等^[2]。已有研究指出,自由职业人员普遍具有专业性、独立性和职业性的特点^[3]。但是,随着新生代群体职业价值观转变、互联网和新技术的结合、内外部环境对就业形势的冲击,自由职业人员在规模

收稿日期:2024-07-07

作者简介:李腾,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营经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及网络统战。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平台载体提质扩面研究”(24BMHZ017Y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激增的同时，其内部结构也日趋复杂。

1. 新经济新业态的自由职业人员激增，群体碎片化更为凸显

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为自由职业人员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新经济新业态的自由职业人员人数激增。以杭州市为例，当前网络作家、自由职业的互联网营销师、MCN机构灵活从业人员等新经济新业态的自由职业人员占全部自由职业人员的61.1%，远超从事传统行业的自由职业人员（见图1）。这一状况深刻改变了自由职业人员群体的年龄结构、行业结构、地域分布等，也使得他们在年龄、学历、收入、价值取向等方面出现了进一步分化，从而导致该群体较难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与成熟的群体意识。

2. 自主性受到一定冲击，话语权部分缺失

为了应对新的市场机遇并规避生存风险，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人员选择注册工作室或小型经济组织发展事业。部分自由职业人员依附于平台谋生，虽不受雇于任何特定组织，但却和平台维持长期经济契约关系。因此，自雇不再是自由职业人员唯一的就业形态，自雇、他雇和雇他相交织的模式成为当前自由职业人员劳动关系的主

流。这增加了自由职业人员与现行经济体制的嵌入性；同时，也导致自由职业人员不再“自由”，工作内容存在虹吸效应，工作流程隐藏“系统刚控”，工作收入实际“隐形减少”^[4]，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自由职业人员的执业自主性，导致他们的话语权部分缺失。

3. 专业准入门槛降低，职业跨界成为常态

不同于传统自由职业人员具备一定专业资质，当前自由职业人员的专业准入门槛在不断降低，其专业权威性正在逐步瓦解。与此同时，随着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自由职业人员的工作正在呈现出服务性和生产性相融合的趋势，兼业成为其工作常态。调查显示，在杭州市的自由职业人员中，同时供职于2个行业以上的占到87.3%。此外，自由职业人员的地域流动性和职业流动性正在进一步增强，这在帮助自由职业人员累积更多社会资本的同时，也影响了他们的行业深耕和职业精神培育。

4. 网络化特征明显，影响力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当前，自由职业人员的工作、生活、社交都呈现出更高的网络化特征。调查显示，7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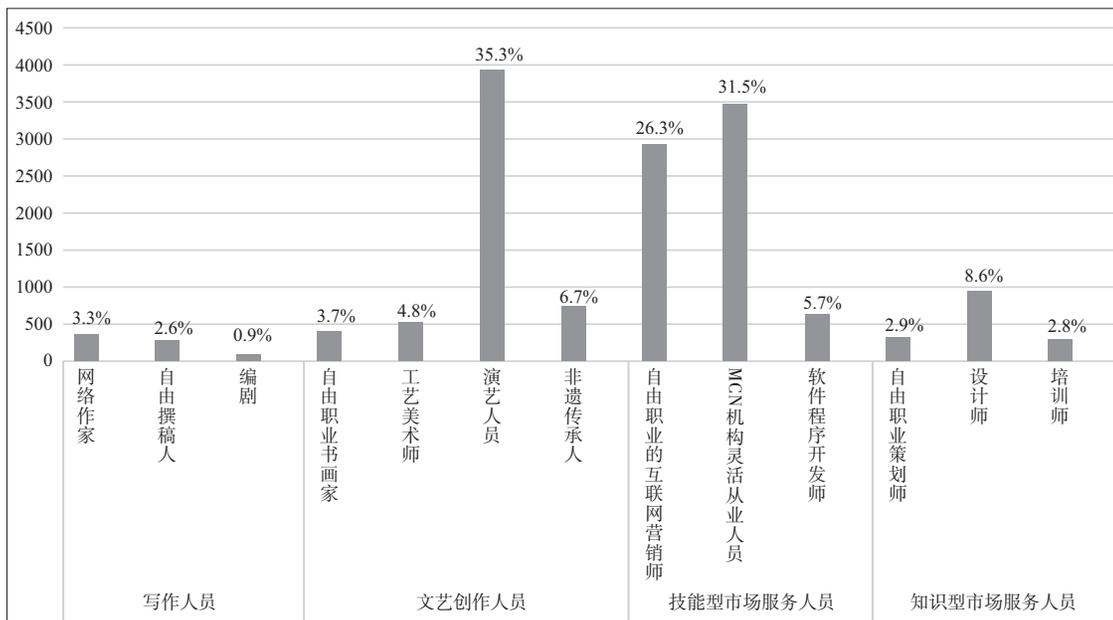


图1 杭州市自由职业人员职业构成比例(含兼业)

的自由职业人员的工作需要依托互联网进行，每天在互联网上进行社交互动的人员比例高达 98.1%。专业性与网络性的相互交织使得部分自由职业人员在网上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但是，除少部分人的影响力较为长久外，大部分自由职业人员的网络影响力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这使得自由职业人员易追逐短期利益，从而存在忽视职业道德甚至触碰法律底线的风险。

(二) 自由职业人员的思想状况

1. 职业繁荣和苦于谋生的双重图景

经济的发展为自由职业人员创造了更多的收入机会，也提高了自由职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尤其是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知识变现的空间。社交软件和平台算法的不断成熟，使得自由职业人员的工作灵活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工作体验较以往更为丰富。调查显示，高达 76.2% 的自由职业人员对当前工作的整体满意度较高，其主要原因包括自主性高 (80.2%)、工作时间弹性大 (77.5%)、实现个人价值 (64.3%)、可以更好地平衡事业家庭关系 (59.6%)、对自身价值的变现度高 (56.6%)。同时，自由职业人员也遭遇着较大的工作压力、生存压力和较高不确定性的职业预期，对行业及自身的未来发展都充满担忧。相比传统行业，自由职业人员较为缺乏劳动保障，在劳资纠纷和职业升级方面都存在较大困境。18.4% 的受访者表示没有签订任何经济合同；84.3% 的受访者表示从未接受过任何有组织的继续教育培训；57.0% 的自由职业人员表示，相比过去，他们必须面临更长的工作时间、更大的工作强度及更大的生活困难；30.2%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未来 6 个月可能会失业；23.4%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在行业会在 5 年内消失。

2. 自我悦纳和社会偏见的复杂心境

自我悦纳与社会偏见使得自由职业人员呈现出高幸福感和低公平感交织的复杂心境，体现在相对较高的自我认同和较低社会认同并存 (见图 2)。一方面，自由职业人员的自我认同度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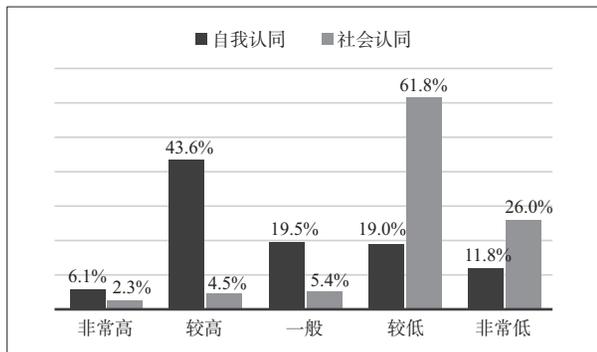


图 2 有关自由职业人员的认同程度

调查显示，近半数受访者的自我认同高。同时，由于具备较高的专业性和服务性，自由职业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荣誉感，并能获得圈内的口碑和尊重，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幸福感。另一方面，自由职业人员与社会其他人群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社会张力。例如，社会对这一群体缺乏认识与理解，有时会为其贴上“不务正业”“无业游民”“啃老”的身份标签，传统行业一定程度上对他们抱有偏见。这些都给自由职业人员带来了较大的负面情绪。调查中，87.8%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遭遇与实际不符的指责与歧视，75.3%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因未获得应有的社会权利而感到愤怒。

3. 社交多维却倍感孤独的社交困境

不同于以往的线下社交，当前的自由职业人员更多借助各类社交软件开展线上社交，极大拓展了朋友圈。调查显示，自由职业人员人人用网、日日在网。这一方面缓解了以往的自由职业人员边缘性明显、社交圈封闭、存在社交时差的社交困境，另一方面却加剧了自由职业人员的孤独和迷茫。调查显示，71.2% 受访者的线上社交是其日常社交的首选，但社交密度增加的同时社交质量并没有相应提高 (见图 3)。很多受访者表示，线上社交大多属于“生人社交”，很难产生共情和共鸣。当面对网络上的多元声音时，由于缺少价值参照系，自由职业人员的价值观容易受到冲击，导致自我怀疑。因此，自由职业人员社交中存在孤独和迷茫依然是常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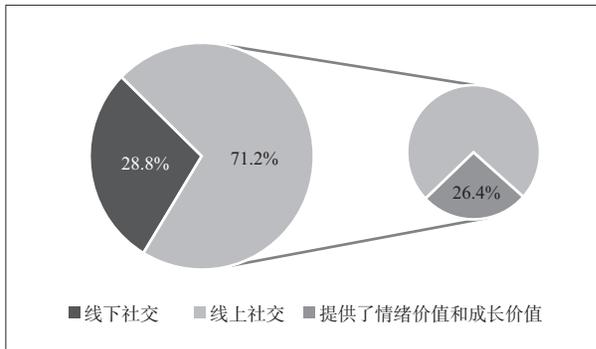


图3 自由职业人员的社交状态

4. 信任政府却政治冷漠的政治倾向

自由职业人员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较高。调查显示，73.1%的受访者相信中国共产党可以带领中国走向更好的未来，69.8%的受访者对当前政府社会经济治理和政务服务表示满意，但86.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政治活动（包括政治培训、建言献策、官方组织的调研考察、参政议政）参与度较低。这样的局面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参政渠道受限，96.4%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如何进行政治参与；二是参政意愿不强，83.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对政治参与不感兴趣，73.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没有时间参与；三是参政能力不足，59.6%的受访者表示对相关的政策不了解，85.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参政能力欠缺，甚至有11.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参政能力极低；四是参政安全感较低，尤其是一些以互联网内容制作为生的自由职业人员担心不小心触碰意识形态红线，对自身事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此外，调查发现，部分自由职业人员的政治关注，通常以切身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参照点，参政动机具有一定的功利主义导向，参与行为具有随机性、偶然性和无序性。

二、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存在的困境

当前，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受限于资源、方法、机制、标准等因素，仍然面临思想引领实效性不高、组织化水平较低、高水平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较难和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困境。

（一）思想引领实效性不高

做实自由职业人员思想政治工作是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任务。针对其所体现的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膨胀的倾向以及价值观异化等风险，传统的引领手段无法完全奏效。例如，在思想引领的内容供给方面，缺乏对自由职业人员的有效联系，导致对他们的思想动态及诉求掌握不全，内容投放无法做到有的放矢，使得引领内容供给与工作对象需求之间存在错配。又如，在工作思维等方面，“以管理代替服务”的思维惯性依然存在，对网络统战的认识不足，缺乏相关理论和实践知识，使得思想引领较难达到预期目标。

（二）组织化水平较低

由于缺乏工作组织的联系，自由职业人员相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其他群体更加渴望通过加入组织或社群寻求归属感，然而受限于组织设计、组织能力等因素，自由职业人员的组织化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其中所凸显的主要问题包括组织覆盖面较窄和组织能力较弱。虽然许多城市的新联会在基层已实现全覆盖，但针对自由职业人员的组织，其覆盖面较为有限。同时，与自由职业人员相关的行业协会及自组织尚未发育成熟，且党组织覆盖不足，也无法与新联会形成组织协同，从而使多数自由职业人员无组织可属。另一方面，近年来出现了一些针对自由职业人员的创新项目与创新基地，但不同程度上存在定位不清、平台载体建设不足、活动质量不高等问题，无法有效服务自由职业人员，也无法使参与其中的自由职业人员更好服务社会，反映出“组织起来”不够的问题。

（三）高水平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较难

各地已相继将自由职业人员纳入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队伍，并从教育培养、管理使用方面展开了相应探索，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依然存在代表性标准不清、建设机制不明的问题。面对自由职业人员这一“碎片化”群体，在如何平衡个

人的社会影响力和群体代表性、一套标准是否可以层层套用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另一方面，对于自由职业人员代表人士的培养，当前存在观察周期长与影响力稳定性弱、管理办法少与队伍建设要求高等矛盾，亟须进一步提升识人能力、完善管人方式、提高用人水平。

（四）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统战资源不足、配置效率不高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客观现象。虽然各地统战部门已采用“借”“导”“引”“融”“联”等方式不断争取更多工作资源，但依然存在工作经费少、工作人手少、工作载体少、工作渠道少的“四少”问题。同时，一些统战干部的思想认识和工作能力尚不能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的部门间协同和分工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统战资源使用中的上下联动、左右打通、区域协同还不够充分。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工作资源的高效使用。

三、提升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效能的理念和路径

面对当前困境，需坚持系统思维，从思想引领、组织化建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及相关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对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进行系统变革。

一是将工作思路从“部门为中心”变革为以“成员为中心”。统战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坚持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作为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再次强调统战工作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因此，需坚持把注重自由职业人员需求，发挥他们主体作用作为重点考量来开展工作，以破解当前统战工作“一厢情愿”的现实困境。二是将工作场域从线下拓展为线上线下融合。针对自由职业人员网络化特征明显的现实，需将统战工作场域从线下拓展到线上。网络统战在凝聚网络共识、丰富参政议政方式、提高统战工作科学化水平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为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

作开辟新阵地、延长工作手臂、提供工作对象全渠道发展的可能。但必须指出的是，不能以“键对键”的网络方式取代“面对面”的传统方式，需积极探索线上线下融合途径，在线上线下两个空间推进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以便更有效地将自由职业人员“组织起来”。三是将工作内容从“做少数代表人士少数方面工作”迭代到促进“全体统战成员全面发展”。沿着“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突破过往“精英”与“草根”的区隔，将工作对象从标志性人物延伸到一般性人士，工作关注点从单向度拓展到全方位，工作目标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础上增加对自由职业人员全面发展的关照，并以更精准的工作内容设计回应自由职业人员的发展性需求，从而发现、选择不同层级的代表人士。四是将统战资源从“碎片化利用”扩展为“集成作战”。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壮大统战力量是做好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的重要保障。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需引入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打破体制界限和区域壁垒，积极争取更多资源并不断提高资源整合效率，促使各类统战力量从“各自为战”转向“集成作战”。这需要在一定范围内推动各种资源进行联通，形成“区域一体、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工作机制，实现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资源从单体配置向平台配置转型，从局域配置向全域配置转型，从单向配置向共享配置转型。

基于上述理念，可以以“四链”同构的路径进一步提升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效能。

（一）建设数字链，以数字化引领统战工作

一是建设数字综合管理系统。不断完善数据采集体系，打通统战部门与其他部门以及自由职业人员聚集平台的数据链，共享自由职业人员人口统计学信息、职业经历、奖惩情况、政治安排、社交行为等信息数据，加强智能计算与深度利用。在此基础上，完善自由职业人员综合管理系统，构建包括工作对象信息库、资源库、组织库、项目库，以及代表人士管理系统和工作对象综合评

价系统在内的数字管理体系。二是构建数字服务平台。推出一站式智慧服务平台，在线提供政策、政务、法律、生活等方面的咨询服务，提供“网络全覆盖、信息共分享、流程可跟踪、行为有记录”的智慧化集成服务，增加自由职业人员的获得感。三是完善网络安全联动系统。通过分布式账本、点对点传输、加密算法、共识机制等可行技术，有效解决早期互联网存在的信息安全等问题，并合理嵌入官方数字安全系统，有效提升自由职业人员对数字化的信任度。联合主要社交平台，智能抓取自由职业人员行为数据，不断完善舆情算法，分析研判自由职业人员思想动态变化，对自由职业人员引发、扩散的重大舆情，构建信息上报、结果反馈、跟踪回访的闭环式运作机制，帮助相关部门及时有效应对。引入网络观察员制度，引导自由职业人员传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

（二）优化供应链，多频共振完善统战工作矩阵

一是拓展资源链，加大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资源投入。鼓励平台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捐助资金，设立自由职业人员相关基金，为自由职业人员发展提供必要帮助。与此同时发挥“统战+”开放合作机制，创立兼具“物联网”和“人联网”特征的“众筹式”、开放型资源整合平台，引入社会多元主体，积极拓展外部资源，在政策服务、资源服务、活动服务等方面，提高面向自由职业人员的普惠性供给。此外，还需统筹协调，构建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资源流通机制，提高资源流转效率。二是完善组织链，打造高效能自由职业人员组织群。结合数字技术打造虚拟组织、临时组织，破除固有边界，拓展统战组织形态，作为现有组织的补充和拓展。创新组织与活动分离模式，探索跨组织活动模式及先组织活动再建组织等模式。培育有引领能力和治理能力的“头羊型”组织，出台相应扶持政策，制定认定标准，促进大中小组织共同发展，推动资源链、创新链

深度融合。以“头羊型”组织的引领作用，带动自由职业人员正向发展。通过联盟、嫁接、结对等多种方式，建设纵横交错的组织网，形成一批跨区域合作、多元主体协同、体系化任务型的高水平组织联合体。联合体可以新建，也可以采用“虚拟组织+”“自组织+”“统战组织+”形式，落实到各大联谊组织、社会组织、行业协会中。创新组织孵化机制，融合一切专兼职力量，为统战性组织设立统战指导员，制定服务清单，为组织发展提供指导帮助，提高统战性组织开展活动的能力和成效。

（三）畅通利益链，维护自由职业人员利益

一是创新制度结构，保障自由职业人员合法权益。确定自由职业人员的身份和法律地位，建立自由职业人员职业分类代码表，不断更新自由职业人员的职业目录，探索该群体社会保障的基本标准。完善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规范平台管理责任，敦促平台建立灵活用工人员劳动保障制度，建立完善有关自由职业人员薪酬福利、社会保障、职称晋升等方面的制度。推动设立“自由职业人员互助金”制度，为有困难的自由职业人员提供一定帮扶。二是帮助谋划职业未来，回应自由职业人员发展性诉求。依托高校、政治院校、教育培训机构、网络学院等，多渠道完善自由职业人员继续教育体系，帮助自由职业人员在知识、技能、政治水平等方面进行提升，构建自由职业人员连贯职业发展渠道。依托互联网平台、自由职业人员聚集的社区、园区，借助政府、企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等力量，设立自由职业人员导师团。探索自由职业人员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模式，提供精准匹配的个体服务方案，为自由职业人员提供更为科学的职业发展规划及更为优质的均等化公共服务。三是提高群体声誉，减少对自由职业人员的社会偏见。完善有关自由职业人员的报道，特别是正面典型宣传，促进社会客观正确了解这一群体。另一方面要注重对自由职业人员中先进人物的表彰，探索建立省级和市

级的荣誉评选表彰机制，强化对自由职业人员的荣誉激励。四是扩大信息沟通，提升自由职业人员政治效能感。在自由职业人员较为活跃的媒体与社交平台建立权威信息发布机制及常态化沟通机制，及时传递相关信息，积极回应自由职业人员的政治关切，引导他们有序参与各类公共事务。与此同时，拓展自由职业人员政治参与渠道，完善基层协商制度，吸纳自由职业人员中的代表人士参加民主协商会、情况通报会和“协商议事会”“百姓议事团”等基层协商建言活动。探索建立网络议政、网络问政、网络监督等网络参政新形式，完善非正式渠道政治参与的引导与监管机制，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的覆盖面和渠道。此外，还需通过教育培训、实践锻炼等形式帮助自由职业人员树立正确的参政观，提高政治参与能力。

（四）升级价值链，助力自由职业人员与国家同向发展

一是梯队化培养代表人士，增强引领性人物辐射作用。依托自由职业人员综合管理系统，重塑自由职业人员发现、培养、锻炼、推荐、使用的流程，扩大选人用人视野，积极推行自由职业人员综合评价体系，建立跨部门协同评价机制，建立评价结果反馈制度，提高选人用人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程度。与此同时，分级分工，加强对思想素质好、组织能力强、层次高、社会影响大的自由职业青年人士的培养。以基层主抓发现、市级筛选培养、省级侧重政治安排的三级联动方式，按梯队建设代表人士队伍，并将代表人

士能否发挥辐射作用放在评价标准的重要位置，建立自由职业人员代表人士流动和退出机制。二是改善自由职业人员价值实现机制，促进自由职业人员作用转化。依托科研院所、高端智库对自由职业人员展开大样本调查，研究自由职业人员发展规律，积极探索自由职业人员全面发展与发挥作用的机制，总结引导自由职业人员发挥作用的经验成果。邀请各级各层自由职业人员代表参与重大社会问题调研，加入各类监督员队伍、矛盾调解员队伍，发挥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鼓励自由职业人员发挥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优势，让他们对内积极参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传播，对外以“网文出海”“网游出海”“直播出海”等形式参与中国海外形象建构，打造“文化中国”出海矩阵。

参考文献：

- [1] 陈喜庆. 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几个问题[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2): 4-15.
- [2] 徐军. 当代中国自由职业人员的特征界定及实践应用[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7(3): 19-27.
- [3] 崔月琴, 刘秀秀. 从“单位人”到“自由人”——我国自由职业者生存特征的社会学分析[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12): 133-137.
- [4] 金华, 陈佳鹏, 黄匡时. 新业态下数智化劳动: 平台规训、风险生成与政策因应[J]. 电子政务, 2022(2): 75-87.

责任编辑: 吉强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论意蕴

徐建飞

摘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内在规律、价值取向和本质特征的体现,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遵循的依据和准则,能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理论启发与实践指导。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根本方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主导性与社会思潮多样性、党性与人民性、批判性与包容性、继承性与创新性以及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方法论意蕴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关系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现实问题。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多元意识形态相互激荡,呈现出竞争与对抗的态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广泛使用算法推送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网络空间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主阵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强化传统线下渗透的同时,借助新兴媒体力量逐步加大意

识形态渗透力度,利用其在网络空间的技术霸权、话语霸权,通过网络宗教、网络游戏、网络文化等形式不断地向我国网络空间渗透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西方价值观,以达到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谋^[1]。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范围逐步扩大化、渗透手段逐渐科技化、渗透方式逐渐隐蔽化。对此,我们要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

收稿日期:2024-06-26

作者简介:徐建飞,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扬州大学理论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扬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交流中心首批兼职青年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新时代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研究”(2023SJD077)、2023年度江苏省教育系统党的建设研究会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青年化阐释研究”(2023JSJYDJ2102)、扬州大学2021年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课题“立德树人视域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研究”(JGLX2021-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研究得到2021年度江苏高校优秀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领航·扬帆”计划、江苏高校“青蓝工程”、扬州大学“高端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阵地，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方式，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引领力、传导力和辐射力。要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来把握方向、坚定立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新征程伟大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既要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又要部署“过河”的任务，既要生动阐释“为什么做”“做什么”，又要明确应该“怎么做”。

一、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相统一

面对多元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我们要始终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于多元中立主导，于多样中成主体，始终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和指导地位，彰显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主导权。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真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是社会主义文化、观念、价值、思想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始终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一元主导地位。在多元文化和社会思潮相互碰撞的时代浪潮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始终坚守着真理的阵地，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坚定的立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引领着思想文化的主流，使其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主导性与社会思潮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有益于构建起一个既充满活力又秩序井然的思想文化生态，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繁荣发展，有利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性和社会思潮多样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主导性决定多样性，起着支配作用，对其他社会思潮起着引导融合的作用；多样性是为主导性服务的，是一元主导的发展，否定多样性，主导性就会变得抽象空洞，离开了多样性，主导性的功能也会随之消失。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原则，也要用主流意识形态积极引导好多样性的社会思潮。只有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社会主义才能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永葆红色江山永不褪色；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

会思潮，广泛汲取有益养分，才能避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充满活力和生机。

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元指导，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是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保持清醒、洞察本质、砥砺前行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坚持真理、辨别是非、廓清迷雾的重要保障。此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上，我们要正视意识形态的差异性，既要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释放一切积极社会思潮的正向能量，在借鉴中求同存异、兼容并包、扩大共识、引领主流，也要用一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揭露各类错误社会思潮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本质，深刻揭露错误社会思潮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在批判中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对多元社会思潮的引领。

二、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意识形态是一种以逻辑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观念体系，是国家、阶级、政党等特定集团的意志、思维、信仰、利益的观念聚集和思想表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国家观念的上层建筑，反映了无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和理想追求，表达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本质上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石，对阶级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作出科学论断，构建起对社会结构、社会变革和人类解放的全面认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价值追求，密切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福祉，努力消灭剥削、压迫，积极建立一个公平、和谐、美好的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倘若离开了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基础之上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失去了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崇与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党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新时代，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党性原则，就要深刻领会到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然要以坚定的党性为前提，以党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为方向和目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坚持党性原则，就是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遵循党的政治路线，坚持以党的思想旗帜为引领、以党的坚强意志为支撑、以党的崇高使命为担当，保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闻舆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都能符合党的立场和要求，做到领先一步、棋高一着，确保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不旁落。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讲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3]，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新时代，坚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党性原则，就是要强化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方针，把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审时度势，看清本质，把握主流。需要注意的是，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洞察舆论传播规律，“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4]，努力让网络宣传空间晴朗起来。总之，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全党动手，“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5]。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闻媒体如何发展，党管媒体的原则始终不变。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要增强战略定力，站稳政治立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所有的工作都必须体现党的意志、宣传党的主张、执行党的决定、贯彻党的政策，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6]，做到爱党、护党、为党。党性原则，亦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遵循和核心准则。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意味着在思想引领、价值塑造和舆论引导等方面，始终与党的宗旨、目标和使命保持高度一致。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只有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以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指引，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不偏离社会主义轨道，不背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在思想引领上不走弯路、不入邪路。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赢得大众认同的关键，在于其依据的阶级基础是否广泛。因此，新时代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夯实群众基础，尊重民意、反映民情、改善民生。坚持人民性，就要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利益观，“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7]，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的思想动态和利益诉求，关照人民群众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追求、道德情感等方面的期盼，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诉求，“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8]。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解决好意识形态建设与话语创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

针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我国的侵蚀与渗透，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尤其要处理好党性和人民性的辩证关系。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党性既来源于人民性又集中体现人民性，两者内在统一。只有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才能在理论宣传、思想传播、舆论引导、价值灌输等方面始终为人民服务。那些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的论调，无论

是在思想上还是理论上，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党性包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9]，党性作为人民性的保障和前提，保证了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正确方向，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属性，在整个意识形态中居于核心位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批判性与包容性相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逐步增强，但也出现了妖魔化诋毁中国的论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炮制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霸权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甚嚣尘上，一些别有用心西方国家大量输出资本主义的精神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企图借助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妄图达到“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在世界文化交流、交锋、交融的大势下，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处理好批判性与包容性的辩证关系。批判性重在运用批判性思维，对于现存的一些思想、观点、文化、理念在特定环境下、具体时空内的合理性进行质疑、反思与追问。批判性内在规定不仅要批判陈旧的、错误的、敌对的意识形态，也要勇于自我批判、自我扬弃、自我更新。包容性需在多种文明碰撞、交流、包容、共处的多元化时代中求同存异、兼收并蓄，汲取古今中外的思想精华，以多元的思维尊重其他文化特点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做到与其他一切优秀文明和谐共处、共存共生。包容性就是一种包含多样性、尊重差异性的价值理念，承认包容性就是承认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包容互鉴。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批评和自我批判的能力。马克思曾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

命的。”^[10]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11]。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凭借话语优势对我国发动意识形态攻势，传播西方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抨击社会主义制度，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企图抢夺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否定、削弱和动摇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批判性原则，批判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揭露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危害，抵制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世俗化的社会思潮，驱散西方的“普世价值”等思想迷雾，防止落后甚至反动的思想文化侵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肌体。此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要加强自我批判，依据不断发展的社会实际，丰富意识形态内容，针对不同的主体差异，优化意识形态的叙事表达，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思潮的论争，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力。

任何思想的存在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其生成与演变都是与其他的外来文化互动、互补、互融，并吸收、消化、借鉴有益“内核”的过程，使之基业长青、永葆生机。封建时代，中国儒学之所以能在很长的时期内居于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与吸收、转化儒家与道家、法家、佛家等诸子百家有益成果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不是故步自封，排斥一切外来文明，而是批判、继承和超越以往文明成果，是与其他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吸收的思想精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功传入中国，并能为广大人民所理解、认同、接受，必然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深深烙印着民族特色，凸显了内在的包容性。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坚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理性地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向上、健康有益的优秀文化因子。此外，要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广泛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寓言故事、成语、典故，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框架体系中，寻找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共有的精神基因，在两者内在契合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烙上民族气派、民族风味和民族特色。

四、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并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是主观臆断的，而是在继承前人有益成果的基础之上，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时代特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创新和优化，最终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意识形态体系。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遵循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原则，继承优秀意识形态的精神遗产，创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理念、新范式、新手段。

意识形态话语生成与体系建构具有历史继承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继承了欧洲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理论，结合中国国情，生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12]。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仍然需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以及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断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品格和光荣传统，是党发展壮大、取得胜利的不竭动力，

也是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对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问题作过多次重要论述。他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13]新时代，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依据时代发展和现实实际，结合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内在诉求，着眼于改造客观世界实践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形势、新挑战、新问题，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念、手段、方法、机制等方面创新，构建起反映时代特征、体现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染力、感召力、影响力。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生成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容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继承、创新发展的动态过程，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坚持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实现继承优秀传统与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结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新的伟大实践，在新的实践探索中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形势、开创新局面，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影响力和感染力。

五、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科学真理，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描绘出美好图景，也为人类的自由、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只有与客观实际、具体环境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一定民族形式表现出来，历经“民族化”的进程，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接受，彰显出其巨大的生命力、感染力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既要根植于民族生活的土壤，立足于民族自身特定的文化历史，以本民族历史文化为主体去丰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传

播，标民族之新、立民族之异，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同时又要站在时代的前沿，着眼于新的实践，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

新时代，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要坚持民族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4]从主体内容上，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植根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沃土，融入民族文化的独特元素和鲜活内容，与民族的历史保持契合度和同一性，与民族艺术欣赏习惯、审美趣味相适应。从叙事方式上，则要了解和熟悉本民族人民的思维方式、话语习惯、表达风格、民族特点，摒弃华而不实的空洞说教，用生动而不庸俗、活泼而不低俗的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赋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回应全球普遍应对的难题，就在于“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5]。在多元文化激荡、交锋、融合的时代语境下，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加强交流与对话，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使其内容和表达形式得到不断丰富。要广泛吸收世界上的先进文化思想，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中吸收新的元素、补充新的养分，提出更具竞争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融通中外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通过文化交流和思想传播，促进不同文化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打破彼此的隔阂，增强多元文化的尊重与包容，使人类文明得以在交流互鉴中打破狭隘的偏见，在包容共存中持续进步、

共同繁荣。

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既要结合本国的客观实际，立足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挖掘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又要紧跟世界潮流，洞察世界发展趋势，吸纳和借鉴世界其他民族意识形态建设的有益经验，汲取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多样社会思潮中的权威性和舆论引导力。

参考文献：

- [1] 赵惜群. 网络精神文明建设研究 [M].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21：159.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594.
- [3][4][7][8][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4、198、154、154、164.
- [5]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51.
-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06.
- [9] 习近平. 摆脱贫困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63.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4.
- [11][1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28、313.
- [13] 习近平在七大会址论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EB/OL]. (2015-02-1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15/c_1114372592.htm.
- [15]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74.

责任编辑：蒋建忠

延安《解放日报》“民主建政” 话语构建及其历史经验研究

徐岑琛 崔雪林

摘要:针对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日益强烈的民主诉求,延安《解放日报》办刊过程中将“民主建政”的话语构建视为其宣传工作的重要一环。通过坚守党报的人民立场、发挥喉舌作用、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把准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等,延安《解放日报》不仅展现了党报引导舆论的强大力量,为党的宣传工作树立了鲜明的旗帜,还为新中国民主政权建设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关键词:延安《解放日报》;民主建政;话语构建

就概念内涵角度而言,“民主建政”是指充分理解和尊重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并构建一个新型的民主政权。这一概念在21世纪初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有学者认为,“民主建政首先是从陕甘宁边区改制开始的”^[1];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对‘民主’的追寻呈现‘争得民主’和‘民主建政’的两条线索”^[2]。但无论其内涵如何,学术界普遍认为“民主建政”是抗日战争初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特定时间段内对民主问题独特的表达方式,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民主建政”的表达才有所减少。1941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创刊,随后

近6年里,涉及“民主建政”的文章多达3000余篇,这为研究延安时期“民主建政”的话语构建提供了重要样本。

一、延安《解放日报》推动“民主建政”话语构建的历史必然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举民主的旗帜,把建立民主政权作为自己的革命斗争目标,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20世纪40年代期间,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抗战胜利并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对民主问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民主建政”话语在延安《解放日报》这一媒介平台上得到了充

收稿日期:2024-07-02

作者简介:徐岑琛,南京大学-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博士后,江苏省委党校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崔雪林,江苏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学术中国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建构及其现实启示研究”(19CDJ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分的展现，并在边区得到广泛实践。延安《解放日报》作为承担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抗战、宣传“民主建政”以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等重要使命的舆论工具，有其历史必然。

（一）对机关党报性质认识的逐渐深化

中国共产党对机关党报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化，是延安《解放日报》推动“民主建政”话语构建并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前提条件。从思想层面而言，至少包括了对机关党报“党性”和“人民性”两个维度的正确认识。

第一，中国共产党对延安《解放日报》“党性”的深刻体悟。就理论角度而言，1905年11月，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首次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出版物的党性原则，他指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5]。中国共产党显然非常明白这一原则要求。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先后创办了《向导》《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刊物，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特别是延安《解放日报》创刊以后，承载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理论思想的重要职能，其社论、代论等重要文章均由中国共产党党内优秀的党员所撰写。在1941年延安《解放日报》创刊初期，刊物上集中刊载大量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对中国共产党努力抗战、边区建设以及国内社会问题报道相对较少，同时，也一定程度地存在文风呆板、内容枯燥等问题，从而被读者批评为“为别人当宣传员”。1942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的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就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6]。此后，毛泽东还主持召开了延安《解放日报》改

版座谈会并发表讲话，针对创刊初期党性不强等问题，集中力量着手推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

第二，中国共产党对延安《解放日报》“人民性”的准确把握。报纸的“人民性”是运用专业的新闻手段来反映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诉求的一种特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报纸不仅仅代表政党也应该是“人民报刊”。1849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5]。延安《解放日报》在不断改革调整的过程中，也充分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报刊”思想。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针对创刊初期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现象，进行了深刻自我批评，指出，《解放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对内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反映群众生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用报纸来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对外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事件的演进，明了世界的发展方向，时刻注意我们的敌人和朋友对我们宣传报道的反应^[6]。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延安《解放日报》又在文风上有了极大调整，一系列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优秀作品得以刊载于报纸副刊上，如马可的《夫妻识字》、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贺敬之与丁毅的《白毛女》。这些作品极大地丰富了边区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进一步提升了延安《解放日报》与边区人民生活文化需求的契合度。

（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这导致党内存在一些较为激进的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呼声。但是，面对军事力量尚处弱势的现实，以及人民对内战的反对呼声，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7]；刘少奇提出，“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决裂……以在全

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以外以暂不实行反攻为妥”^[8]。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尽力缓和两党关系，另一方面借助延安《解放日报》这个有效的舆论工具，不断调整宣传内容，竖起民主旗帜反对国民党独裁野心，激发人民群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可。

第一，延安《解放日报》借助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强调党派合作的重要意义。延安《解放日报》针对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国际形势，暂时停止对英、美的批评性报道，转向宣传中国抗战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表达了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坚定决心。1941年8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我国抗战四周年之民主政治》，文章直接将“追求民主”和“反法西斯战争”统一起来。文章强调，法西斯夺到了政权以后，他们就推翻了民主政治的标识，民选的议会被代替，法西斯主义就是爱好民主自由的人们和劳动群众的死敌^[9]。与此同时，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大西洋宪章》相关内容及内含的民主精神，甚至还报道了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的新闻，以及美国共产党领导者得以释放的消息，以此强调人民的民主诉求，必须通过党派合作才能得以实现，“互相合作，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中国亟待提倡和效法的，是符合民主诉求的”^[10]。

第二，延安《解放日报》就战后中国的民主前景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激发广大群众对党派间合作意向的认同与支持。除了从反法西斯主义角度阐述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以外，还不断畅想新中国未来的民主图景。例如，1942年7月，延安《解放日报》特别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特别强调，“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主的中国，既不是专制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少数人专政多数人无权的中国。总之，战后中国的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

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11]。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已在国内民众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两党关系处理上，通过巧妙实施的“宣传攻势”与“军事守势”，赢得了广大民众及中间力量的普遍认可与支持。

（三）宣传党的民主理论的需要

延安《解放日报》致力于构建“民主建政”的舆论环境，这既是对国共两党政治立场差异与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的回应，亦是对宣传自身民主政治理念责任的履行。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邀请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前往重庆参加和谈。中国共产党决定前往重庆进行谈判之际，已敏锐洞察到国民党可能利用会议借机拖延时间，调动兵力抢占胜利果实。对此，中国共产党借助延安《解放日报》明确传达并深入阐述了其坚定的民主立场和诉求。

第一，通过延安《解放日报》持续且坚定地强调党的民主立场。该立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诉求高度契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事业的坚定承诺和对人民意愿的深刻把握。例如，延安《解放日报》于1945年8月及时刊登了《为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毛主席飞抵重庆》的重要新闻，文章刊载了毛泽东抵达重庆后的发言：“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期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军事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12]1945年10月，国共两党代表正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双十协定》。紧接着，延安《解放日报》迅速刊发了该协定的全文，详尽报道了国共双方在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地位以及地方自治等多个关键议题上所交换的立场与意见。这一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积极争取民主、推

动国家进步的坚定决心与迫切愿望。除此之外，延安《解放日报》还在此期间发表《要求国民党当局履行“还政于民”的诺言》《必须实现双十协定》等，督促国民党履行诺言。延安《解放日报》围绕重庆谈判的报道，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掀开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新篇章。

第二，通过延安《解放日报》宣传民主实践的最新成果。重庆谈判以后，延安《解放日报》不仅继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立场，与国民党展开舆论斗争，还对解放区“民主建政”实践展开报道。例如，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召开了三届一次参议会，延安《解放日报》指出，“边区的选举运动和这次参议会证明边区人民能充分做到‘自己管理政权，发挥各种自由权利’”^[13]。同时，配合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从侧面宣传“民主建政”的成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首先就要使广大农民从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下翻身，并推动他们起来进行新的民主建政”^[14]。这一宣传方针，不仅激了解放区人民群众对土地改革的热情，也促进了人民对“民主建政”问题的深刻理解。这一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则将得到比一九四六年更重要的胜利”^[15]。

二、延安《解放日报》推动“民主建政”话语构建的三个维度

延安《解放日报》在推动“民主建政”话语构建方面，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解读。首先，该报致力于为解放区塑造并传播一个民主政府的积极形象。通过翔实报道和深入分析，描绘了解放区民主政治的实践路径和成果，使人们对民主政府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刻的认识。其次，报纸积极巩固“联合政府”的理念。它呼吁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共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共同建设新中国。这种理念的传播，有助于加强各阶层之间的团结，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最后，

延安《解放日报》还着力强化对民主制度的阐释。它从理论上对民主制度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民主制度的政治优势和优越性，为人们理解并接受民主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塑造民主政府形象

良好的政府形象，作为公众对政府信任、认同与支持的综合体现，不仅为政府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石，更是政府有效进行外部传播、扩大影响力的关键前提。回溯至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地以“民主建政”为标志，在解放区塑造民主政府的正面形象，以彰显其政治理念与价值观念。

在广泛的理论传播与新闻报道中，延安《解放日报》着重对“五一纲领”和“三三制”政权等核心政策进行了深入宣传，并积极报道有关成立各级参议会，大力推进普选运动的新闻。这一系列举措旨在展现政府人员构成的新模式以及民主参政所取得的新成效，从而塑造出一个崭新且充满活力的民主政府形象。例如，延安《解放日报》在1941年5月发表社论《施政纲领——到群众中去！》。这篇社论将解放区和国统区进行了生动对比，在谈论国统区的选举方式时，毫不留情地指出，国统区是“一党专制，把持包办，强迫入党，排斥异己”^[16]，但解放区这里是，“本党愿意与各党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之管理”^[17]。文章在谈论政治权力的归属问题时指出，国统区是“国家政权操之少数豪贵之手，人民权利与自由，毫无保障”^[18]，但解放区这里是，“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等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讯或处罚”^[19]。

（二）强化民主制度阐释

除了塑造民主政府形象，中国共产党还深刻认识到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人民群众的

“民主诉求”最终必须通过制度得以保证。延安《解放日报》在构建“民主建政”话语的过程中，始终将制度的阐释作为关键一环。特别是伴随“三三制”政权相关实践工作的不断推进，毛泽东、谢觉哉、董必武等纷纷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对“三三制”政权进行解读，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谢觉哉。

第一，对“三三制”政权的制度阐释。1942年3月，报纸刊发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连载文章，客观分析了“三三制”政权的实现基础。一方面，文章强调社会各个阶层是现实存在的，而且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强大力量，并相互制约，这就使得在政权的人员构成上不得不考虑每一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文章指出现阶段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集中社会每一个阶层中的积极力量，让每一个阶层都可以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才可以提高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性。

第二，对参议会制度的报道。延安《解放日报》对参议会制度进行了详尽的报道，特别对民主选举的成效进行了量化分析。例如，报纸于1942年8月刊发文章，对晋察冀边区7个县的县、区、村选举情况进行了详尽报道，并通过精确的数据直观展示选举的成效，为民众提供了清晰的信息参考。文章称，“无论男女，参加县一级选举的公民总数占到总人口的78.3%，参加区一级选举的公民数占总人口的81.4%，参加村一级选举的公民数占总人口的83.9%”^[20]，并且指出妇女也积极参加到选举中来，“妇女参加村选的占妇女总数的83%，参加区选的占81%”^[21]。

延安《解放日报》对“民主建政”宣传阐释结合着相关的民主实践，使得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根据地成功营造了一种浓厚的民主氛围。这种民主氛围并非空洞的理论，而是切实地融入了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社会。这一过程不仅塑造了一个有远见、政治活跃的人民群体，更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所倡

导和追求的“大众民主”目标。

（三）宣传“联合政府”构想

延安《解放日报》在推动民主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定地倡导着“联合政府”的理念，这一理念的贯彻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与历程。特别是在抗战进入尾声，民众对于民主政权的期待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延安《解放日报》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不断传播着“联合政府”的构想，旨在汇聚各党派、各阶层的力量，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

第一，阐明构建“联合政府”的必要。延安《解放日报》经过深入剖析与对比，指出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已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有潜力超过国民党，展现了强劲发展势头和坚定信心。1944年6月，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会见记者的对话，毛泽东一改以往平和的口气，批评国民党道，“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22]。同时，毛泽东也强调，中国人民所缺的不仅仅是民主的意识，也不单单是简单的民主诉求，而是“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23]。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延安《解放日报》，不断地宣传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以及表明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联合政府”的决心。延安《解放日报》充分发挥了舆论引导的重要作用，通过发表一系列评论员文章、社论和专访，深入阐述“联合政府”的内涵与意义，积极倡导各党派、各阶层共同参与，推动民主政权建设。同时，报纸还报道了许多典型事迹和先进人物，以激励广大读者坚定信念，为实现“联合政府”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第二，阐明“联合政府”的基本内涵。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1945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对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报告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宣传，其篇幅足足有6个版面，并且发表社论《中国人民胜利的

指南——读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社论指出，中国要建立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最广大成分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即“联合政府”，并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联合政府”所采取的立场和决心。社论号召，“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给了全国人民胜利的指南，我们要细心研究这个报告，遵循他所指出的方向，向胜利前进”^[24]。之后，延安《解放日报》还刊登了《论联合政府》报告全文，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体制应该是“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25]，战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应该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26]，战后中国的政权形式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27]。

延安《解放日报》对“联合政府”的宣传逐渐赢得了党内的广泛认同。1945年，有学者指出，“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坚持很久的主张，且“我们为什么主张联合政府：第一，国民党一党专政，在法理上和事实上都不应再继续下去了，而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最妥当的办法就是成立联合政府；第二，只有联合政府才能团结全国一切政治力量，团结全国人民，保障国内的和平和统一；第三，只有联合政府才能实行为人民所需要的民主政策，并且筹备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确立民主的宪法而永奠民主新中国之基”^[28]。

三、延安《解放日报》“民主建政”话语构建的历史经验

回顾延安《解放日报》对“民主建政”话语的构建，其始终秉持着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使命感，克服重重困难，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权建设作出了重要奠基，其中的一些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

（一）坚持党性原则和“全党办报”理念的高度统一

回顾延安《解放日报》，其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对于推动党报事业的蓬勃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党报要坚守党性，必须确保从观念、组织、到宣传内容均与党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正如延安《解放日报》的文章指出，“一切依照报馆同人或者工作人员个人办事，不顾及党的意志，一切依照自己的高兴不高兴办事，不顾及党的影响。办报办到那样，就一定党性不强，一定会闹独立，出乱子”^[29]。从1941年5月正式创刊至1947年3月停刊，《解放日报》历时5年11个月，累计出版2130期。特别是在推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过程中，毛泽东通过实践经验总结，逐步确立了“全党办报”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强调，党报作为党的耳目喉舌，必须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发挥其指导各地工作的作用；党组织和党员应高度关注党报，积极阅读党报，并为党报撰写文章，党组织和党员还肩负着推广党报、扩大党报发行量的责任，每个单位都应设立墙报，以增加报纸的覆盖范围，等等。正是党性原则和“全党办报”理念的高度统一，延安《解放日报》才能在办刊发行近6年里，刊发有关“民主建政”的文章3044篇（见表1）。这些文章分别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组织，作者涉及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和一般党员，以及民主人士。大量优质稿件的汇聚，为宣传中国共产党民主政策，向错误言论开展舆论反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表1 延安《解放日报》有关“民主建政”文章的统计

《解放日报》索引编号	时间	文章数量
第1册	1941年5月—1941年12月	462篇
第2册	1942年1月—1942年12月	641篇
第3册	1943年1月—1943年12月	215篇
第4册	1944年1月—1944年12月	384篇

《〈解放日报〉索引》编号	时间	文章数量
第5册	1945年1月—1945年12月	745篇
第6册	1946年1月—1947年3月	597篇
合计	5年11个月	3044篇

注：数据来源参见《〈解放日报〉索引》。该索引将延安《解放日报》的文章分为4个大类：马克思列宁主义类，中国类（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形势、中国对外关系、战争、解放区、国统区6个子类别），国际类，评论类。在“中国类”的“解放区”子类别中，又明确标明了涉及“民主建政”的相关文章。

（二）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的高度统一

延安《解放日报》无论是改版还是在推动“民主建政”话语构建的过程中，始终秉持鲜明的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这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鲜明的问题导向源于对人民群众所关心问题的热切关注。在回应人民群众关切问题的同时，延安《解放日报》也配合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工作方针，从而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第一，面对解放区人民对民主问题的热切关注，报纸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民主观念和边区民主实践展开宣传报道，同时还配合进行制度解读。例如，边区人民对民主问题热切关注，但对相关制度流程不熟悉，陈夷、谢觉哉等针对这一现象，于1942年上半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其中，谢觉哉的《乡市参议会怎样工作》《边区、县参议会常驻委员会的工作》、陈夷的《怎样开乡市参议会》等文章从不同方面对参议会的召开进行了指导。又如，在“三三制”政权设立之初，部分人对“三三制”政权有所误解，将该项制度安排视为“拉拢党外人士”的一种策略，更有人以“找不到合适人选”为借口，拒绝与党外人士建立合作关系。针对这种关门主义错误，延安《解放日报》进行了批评，并明确指出唯有团结各党派及广大人民，形成联合战斗态势，方能有效击败日本侵略者。

第二，除了介绍民主制度之外，延安《解放

日报》亦深入解读了监督与罢免制度、“精兵简政”与“帮忙政府”等政策，并且深刻思考了各类政策和“民主建政”之间的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之际，鉴于边区财政经济的严峻挑战，以及人民生活需要得到关注和保障的情况，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提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议案，获得党中央认可。伴随着机构精简和大生产运动的推动，人民生活状况得以改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30]。在此期间，报纸始终将“精兵简政”视为宣传“民主建政”的重要一环，发表《精兵简政》《简政不是“减政”》《民政厅整编完竣，民政视察团赴陇东》《边区政府建设厅整编完成，改设三科六局加强建设领导》等理论宣传文章或新闻报道，不仅介绍了“精兵简政”的政策内容和实践成效，也报道了“精兵简政”过程中听取各单位工作人员和群众意见的民主做法。相关宣传报道让人民群众深刻感受到“精兵简政”这一举措的重要意义，以及边区开展各项工作过程中的民主氛围。

（三）坚持话语风格严谨性和大众化的高度统一

在延安《解放日报》的积极推动下，“民主建政”话语逐渐深入人心，不仅有严肃的理论宣传，也有严谨的政策制度解读，还配有生动的报道。各类文章作者深入田间地头，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惑，通过与人民群众深入交流，收集了大量鲜活、生动的素材，用真实的故事来诠释“民主建政”的深刻内涵，将“民主建政”的相关问题用方言土语表达出来，形成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风格。通过生动而精准的表达，不仅有效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在基层民主建政的实践，而且巧妙捕捉了相关细节，充分展现了边区“官民平等”的民主氛围，深深打动了众多边区的穷苦人民。同时，延安《解放日报》刊载有关刘志丹、李公朴、刘

胡兰、闻一多等人的英勇事迹，深入报道了边区劳动模范、党员模范、妇女模范、文艺工作者模范、文教模范、医护工作者模范等众多楷模的故事，以此助力群众路线的开展，树立良好的民主政治氛围。此外，延安《解放日报》还刊载了大量有关“民主建政”的宣传画，如《介绍候选人》《定边回民自治乡乡选之一幕》《“奶奶，要等几年以后，我才有选举权？”》等。这些丰富多彩的画作和宣传内容，不仅展示了边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新气象和新成就，也促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民主建政”的宣传体系，体现了话语风格严谨性和大众化的高度统一。

参考文献：

- [1] 陈先初.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 [J]. 抗日战争研究, 2002(1): 132-160.
- [2] 石琳琳. “争得民主”与“民主建政”的双重变奏——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演进逻辑 [J]. 湖北社会科学, 2022(8): 11-21.
- [3]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3.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G].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26.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15.
- [6] 致读者 [N]. 解放日报，1942-04-01(1).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中卷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58.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刘少奇年谱（1898—1969年）：上卷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26.
- [9] 董必武. 我国抗战四周年之民主政治 [N]. 解放日报，1941-08-05(1).
- [10] 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被释放 [N]. 解放日报，1942-08-29(2).
- [11] 中共中央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 [N]. 解放日报，1942-07-07(1).
- [12] 为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毛主席飞抵重庆 [N]. 解放日报，1945-08-29(1).
- [13] 民主团结的大会——庆祝陕甘宁边区三届一次参议会胜利闭幕 [N]. 解放日报，1945-04-28(1).
- [14] 减租减息是一切革命的基础 [N]. 解放日报，1946-03-26(1).
- [15] 毛泽东. 新年祝词 [N]. 解放日报，1945-01-01(1).
- [16][17][18][19] 施政纲领——到群众中去！ [N]. 解放日报，1941-05-21(1)、(1)、(1)、(1).
- [20][21] 晋察冀边区民主选举 [N]. 解放日报，1942-08-26(1)、(1).
- [22][23] 毛泽东答中外记者问 [N]. 解放日报，1944-06-13(1)、(1).
- [24] 中国人民胜利的指南——读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 [N]. 解放日报，1945-05-02(6).
- [25][26][27]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 [N]. 解放日报，1945-05-02(1)、(1)、(1).
- [28] 沈若谷. 我们为什么主张联合政府？ [J]. 文萃, 1945(14): 3.
- [29] 党与党报 [N]. 解放日报，1942-09-22(1).
- [30]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7.

责任编辑：吉强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 精神品格与理论特质

王超 冯亚辉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厚,其核心要义、精神品格与理论特质内在统一,不可分割。其核心要义主要由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薪新定位文化的价值作用、加强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五大方面构成。这五大方面不仅蕴含着独立自主、开放发展、守正创新的精神品格,而且彰显了传承弘扬与转化发展相统一、开放包容与自信自强相统一、中华文化立场与人类文明情怀相统一的理论特质。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自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以来,学界就对其进行了多维度阐发。例如,袁银传等着重阐发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将其归纳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陈一收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与精神气质解读为“文化自信”^[2]。目前,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成果众多,但较少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品格与理论特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事实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品格与理论特质并不是彼此割裂的。从系统思维的角度考察,习近平文化思

想的核心要义处于基础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品格与理论特质,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品格与理论特质则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在精神与理论层面的集中阐释。总之,三者密不可分,有机统一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中。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

(一)文化继承: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念兹在兹的大事要事,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性,

收稿日期:2024-06-29

作者简介:王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与意识形态;冯亚辉,中国石油大学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创项目“‘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2024-KY-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解释得特别清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因此，我们在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和推动中国各项事业发展时，根本无法避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本不可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深刻洞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价值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4]这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表明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作用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为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了榜样。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协调引导公民的思想道德与行为习惯，是对《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继承与弘扬，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继承性，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破除了近代以来国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不自信，打通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隘，使中华文化展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部分国人认为，只有彻底地抛弃中华传统文化，全面彻底地学习西方思想文化，才能拯救中国于水火，这就是所谓的“全盘西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了连续4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取得这一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重新彰显，也使世人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智慧用以治国理政。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华政治伦理，将其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以义制利，以道制欲”的中华经济伦理创造性转化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思想；将“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中华社会伦理创造性转化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最好的继承就是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的价值愈发凸显，中国人民有信心在传承本民族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二）文化创造：以创新精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5]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来源于中华民族自古有之的创新精神。《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系辞下》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诗经·大雅》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易·杂卦》中的“革故鼎新”，等等，这些古代典籍中所阐发的“日新”“革新”的价值理念，展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民族。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当代体现。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在文化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世界范围内文化创新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国家间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愈发从幕后走向前台。历史表明，每逢重大历史关口，中华文化总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6]。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应运而生，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的内在使然。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这一文化创新方式的硕果和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不是简单的拼凑拼盘，它本身就是一大创新，而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经由“结合”而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新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形态，凸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

新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是文化创新的结果，而且还强调文化创造，要求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标识性概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定然不是为了重现历史的旧貌，而是为了超越传统，再现中华文明的时代新颜，因而必须充分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创新精神。一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使其同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相符合，才能古为今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实现创新性发展，才能更好地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更加深厚的文化基础。二是吸收世界文明的积极成果。在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我们要始终秉持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坚持同世界其他一切文明进行交流互鉴，走出一条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道路。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辩证法”^[7]。无论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抑或是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化，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有选择性地汲取古今中外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外来文化的本土化，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打造一批熔铸古今、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深入发展。

（三）文化主体性：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反映一个国家或民族对自身所创造的文化的自信程度以及自觉意识。历史表明，丧失文化主体性，将会令一个国家彻底迷失自我，沦为强势文明的附庸，而且会使国民丧失身份认同的根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

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8]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有力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牢牢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中华大地为现代文明创新发展的实践场域，真正做到“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9]。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中华文化立场同世界视野的有机统一，在转化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积极借鉴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真正体现了这一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0]。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两个结合”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方法，真正做到了这一文化主体性“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11]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得以高扬，充分激发了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文化创新创造需要主体，只有确立了文化主体性，文化发展才会更具活力。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凸显了党推动新时代文化创新发展、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主心骨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成立之初就展现出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团结带领中华民族继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现代文化，以生动的实践有力地夯实了自身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身份和核心地位，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正确航向。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文化创造必须依靠人民和文化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之间的动态平衡中，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既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进行文化创造时，时刻把人民装在心中，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又要求我们把人民作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将人民视为评判文化作品的“裁判员”，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化工作者的天职。

（四）文化价值：将文化的重要价值提升至新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格外突出了文化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两个大局”，对文化的价值、地位进行了新定位，从价值层面突出强调了文化之于个人、民族乃至国家的重大意义，创造性提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这一重大论断凸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价值意义的深刻认知，彰显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对强国建设顺利如期实现的重要保障作用，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的重要地位以及价值作用的认知达到了新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3]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史看，中华民族虽遭遇了无数的磨难厄运，但从困境中走出得以重生，其中一个尤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华民族在世代代的生息繁衍中培育出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为我们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困苦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14]的战略高度，阐发了文化建设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意义。历史表明，国家崛起、民族复兴以及人民幸福都离不开文化的繁荣与兴盛。

（五）文化包容：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15]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中华文明突

出的包容性。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者都具有开放包容性。马克思主义在创立之初就是汇聚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集大成者。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开放包容，积极吸纳人类最新文明成果，以此来充实发展自身，展现了突出的开放性。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兼收并蓄。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始终处于指导地位，以自身的真理性，使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得以充分激活，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文化土壤，以自身的人文气质、道德规范和精神追求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发生了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容融汇而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这一思想的魂脉；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这一思想的根脉。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同时，还以开放包容的胸怀积极吸收借鉴世界其他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充实发展自身。例如，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及他早年阅读大量俄罗斯、法国及德国作品的经历，并阐述了这些作品对他的启发。又如，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中，讲述了他早年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故事，并真挚地说：“我相信，每个读过莎士比亚作品的人，不仅能够感受到他卓越

的才华,而且能够得到深刻的人生启迪。”^[16]可见,这些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不仅为习近平总书记个人的成长提供了智慧启迪,也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提供了有益养分。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是文化包容的产物,而且还坚持文明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推动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达至“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境界。首先,坚持文明的平等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17]各国只有放弃“唯我独尊”“妄自尊大”的文明优越心理,才能真正切实增进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其次,坚持文明的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异质文明要“少一点傲慢和偏见、多一些尊重和包容”^[18],在求同存异中取长补短,实现各自文明的长足发展。最后,坚持文明的开放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19]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即各文明只有以开放的态度,不断创新发展,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品格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品格不是彼此分立的,而是内在统一的。也就是说,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核心要义的五大方面内容,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独立自主、开放发展、守正创新的精神品格。

(一) 独立自主

一是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20]。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社会的急剧变革,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儒、道、墨等各派学说,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有孔子、老子、墨子等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理念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独特贡献。随后,中华文明以会通精神汲取其他文明的优秀内核,在回应挑战中不断自我发展,形成了儒释道互补的传统文化格

局。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更新再造,开启了现代化之路,开创了中华文明繁荣发展的历史新局面。

二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具有高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21]。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数不朽的传世佳作,相信今后我们也一定能够“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创造出更多影响世界的具有民族特点和个性的文化精品,让新时代文化以鲜亮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三是对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具有高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22]从历史上看,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内容的古代经典著作,不仅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为整个人类文明贡献了一系列人文与自然的科学成果。

(二) 开放发展

一是以开放包容之姿,融通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资源来实现自身生成与进一步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党的理论创新的魂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同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从其中汲取营养,实现自身发展。此外,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批判性借鉴国外优秀文化资源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概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国外优秀文化为补充的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

二是对待世界不同文明的开放包容的态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认为文明具有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与开放性，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3]，正是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得以丰富发展。其一，文明是多样的和多彩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24]正是由于文明具有多样性，才使文明的交流互鉴具备了重要价值。其二，文明是平等的。“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25]只有抱持文明平等的观点，人类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才具备了前提。其三，文明是包容的。“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26]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博大的胸怀包容“异质文明”，在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超越了文明的冲突与隔阂。其四，文明是开放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交往中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以及世界新文明观的形成。

（三）守正创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的精神品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兴党、立国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项根本制度，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足发展，关涉我国文化发展方向与道路选择的重大理论与制度创新。二是自觉贯彻“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历史征程中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经验和最大法宝。贯彻落实“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要在进行理论创新时自觉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并立足于当代中国伟大实践使两者深度融合，进而创造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文化形态。三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即坚持党在文化传承、创新、发展过

程中的主导地位。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作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环节，不仅关乎新时代人民群众的认同问题，而且关涉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性质、方向、道路、方法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因而必须坚持和不断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四是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坚守和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就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华文明演进的推动者的角色地位，广泛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积极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的精神品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真正做到古为今用。二是积极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积极汲取西方优秀文化以滋养自身，切实实现洋为中用。三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习近平总书记以“三个事关”精准定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地位，把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两个结合”等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法，以“七个着力”明确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目标任务，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新时代文化发展的使命任务，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实现新的发展。可以说，守正创新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底色，也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品格。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与精神品格内在决定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传承弘扬与转化发展相统一、开放包容与自信自强相统一、中华文化立场与人类文明情怀相统一的理论特质。

（一）传承弘扬与转化发展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

度，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底蕴。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与文明相比，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流变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演进之路，形成了价值理念独具特色、文化思想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这一文明体系不仅在历史上保障了中国的统一，而且也为当代的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富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作用的基础上，反复强调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而且深度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传承弘扬性。

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27]这就要求我们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切不可照搬照套，而是要根据当代发展变化了的实践和新的时代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架起传统通往现代的“桥梁”，共同服务于以文化人的时代重任。这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的转化发展性。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力展现了其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的传承者、弘扬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糟粕部分的批判者、摒弃者，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与转化发展的辩证统一。

（二）开放包容与自信自强相统一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而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自然继承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突出特性。例如，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积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自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虚心学习借鉴各种有益资源，而不能封闭自守、故步自

封。又如，在处理世界文明交往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破解了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及“文明优越论”，彰显了突出的开放包容性。

习近平总书记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要求吸收借鉴其他优秀文化，恰恰凸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自信自强的理论特质。放眼世界，真正敢于、善于开放包容的民族，无一不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高度的自信自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28]文化自信方能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与现实实践，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同世界文化交流碰撞中，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实现了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在开放包容中促进了文化自信自强，彰显了开放包容与自信自强的有机统一。

（三）中华文化立场与人类文明情怀相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厚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在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传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中，坚守了中华文化立场。首先，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实践与当代实践，使习近平文化思想成为中国历史与现实接续演绎出的具有中华文化精神标识的中国道理与中国理论。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29]这深刻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珍视，高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又以世界眼光看待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在民族与世界的辩证统一中以“文明交流互鉴”妥善解决了中华文明独立性与繁荣发展世界文明的关系。最后，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定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强调在传承的基础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传承与发展的辩

证统一中，彰显了坚定的中华文化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毫不动摇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同时，以胸怀天下的宏阔视野，表达了对世界文明的深度关切，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的人类文明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30]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演进大潮流、世界演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的精准研判和深刻把握。本着对人类文明高度负责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全球文明倡议，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立场与人类文明情怀的高度统一。

参考文献：

- [1] 袁银传，邵雪.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3)：5-15.
- [2] 陈一收. 文化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与精神气质 [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1)：95-103.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0-471.
- [4] 习近平.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 [J]. 求是，2022(14)：4-8.
- [5][8][9][10][11][15][20][28]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2023(17)：5、9、9、9、9、6、5、11.

- [6][12]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5.
- [7] 李冉. 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学理省思 [J]. 毛泽东研究，2023(6)：23-28.
- [13]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3.
- [14]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 秉持开放包容 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力量 有利文化条件 [N]. 人民日报，2023-10-09(1).
- [16] 人民日报评论部. 习近平讲故事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76.
- [1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59.
- [18][1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58、470.
- [21][22]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6：4-5、5.
- [23] 习近平.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7.
- [24][25][26] 习近平. 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11、12.
- [27][30]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81、18.
- [29]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

责任编辑：王天海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共同富裕演进路向

殷一博 高秋茹

摘要:中国共产党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同富裕的科学构想,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均富”“义利”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不断探索完善的思想成果。中国共产党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呈现出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特征,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探索萌芽,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创新发展,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具象实践,接续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认知和实践探索达到新高度。新时代以来,通过做大“蛋糕”夯实共同富裕基础、做好“蛋糕”提高共同富裕质量、分好“蛋糕”完善共同富裕保障,构建出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互融共促的全新格局。

关键词: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理论;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下加以考察,通过梳理其理论维度、历史维度及实践维度的演进历程,能够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间的时空交互逻辑,提供多重观察视角与解读坐标。

一、共同富裕:追寻现代化的思想继承与理论创新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和批判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后,为指引无产阶级追求全人类解放所作的科学构想,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均富”“义利”思想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始终秉承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自觉和回应历史任务的理论自觉,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旨归,不断推进共同富裕中国

收稿日期:2024-06-14

作者简介:殷一博,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贫困治理;高秋茹,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及其世界借鉴意义研究”(18XKS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化时代化理论创新，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共同富裕从科学构想到具象实践，开辟了共同富裕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新境界。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共同富裕的发展趋势

1. 制度前提：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认为其本质是阶级分化和阶级剥削。私有制决定了无论处于何种社会形态，资产阶级总是占有社会大多数生产资料，而“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2]。基于资本与劳动分离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科学预见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后，“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这种个人所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否定，提倡重建新型的社会公有制生产关系，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在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下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创造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社会财富。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私有制社会条件下的贫富分化现象，揭示生产资料之“公”消灭生产资料之“私”的必然规律，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基本前提。

2. 实现路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劳动成为第一需要

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的矛盾，加速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两极分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与矛盾，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大浪费，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

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4]。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目标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能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恢复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性”。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后真正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捕捉生产力发展这一关键因素，科学预见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的性质从单个人的劳动变为社会劳动，揭示了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

3. 根本目标：保障社会财富共享，实现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生产资料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有，劳动者按照自愿的原则联合进行生产劳动，参与消费资料和社会财产的分配，成为劳动成果和社会总产品的主人。在承认劳动技能存在差异而造成消费资料占有不同的前提下，共产主义社会最终目的是实现最大限度保障社会财富共享，“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6]。在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超越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阶级的个人”的自主意识和自觉性充分发挥，不断提升在艺术、科学、兴趣、爱好方面的能力，成为“有个性的个人”，“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7]。实现从物质的富足到人的全面发展转变，实现人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实现人的解放的价值理想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追求，“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是践行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核

1. 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天下为公、共同富裕的思想观念在中国历史

长河中存在数千年之久。孔子提出了以“人的关怀”为精神内核的“大同”理想来应对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社会现象，强调顺应天道是统一公天下与家天下的最高准则，也是所有社会形态有序运行的价值遵循。“公”力求建设“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和谐社会，这正是共同富裕的初始表达。老子主张无为而治、无名之朴，在《道德经》中构想了“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美好社会。此外，墨家奉行的“兼相爱、交相利”理念，都为近代中国人追求共同富裕提供了思想资源。例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建构了“无邦国、先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孙中山借助三民主义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其最高理想。

2. “均富”的公平理念

均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一直追求的社会理想，孔子用“均贫富”反对阶级社会中以社会财富占有的多寡决定社会地位高下的不合理现象，以“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为社会共富正名，以“礼”作为财富占有的基本原则，坚持富民、重民、利民、惠民、养民，严厉批判了当时统治者实行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以及严重的赋税徭役造成的贫富分化、贫富无度的社会现象。道家、墨家、法家也深知治国之要在于富民、利民，提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均等思想、“权有无、均贫富”的财富分配思想、“裕民以政”的富民思想、“论其税赋以均贫富”的均富思想，也为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支撑。

3. “重义轻利”的道德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注重高尚情操与道德修养，重义轻利、非义不取的价值观在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儒家将“义”看作是维护社会公平、为百姓谋取公共福利的基本标准，孔子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集体主义和整体利益高于

个人利益，在义与利发生矛盾冲突时，必须以“义”作为个人行为规范的准则与尺度，“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观念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道德风向标。此外，管子提出“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认为“义”来自物质生活的富足，百姓在物质生活富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精神富裕，达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统一，推动社会的进步与繁荣。古代义利之辩深刻阐明了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兼顾效率与公平、缓解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等现实社会矛盾提供了价值借鉴。

（三）共同富裕中国化理论的初步探索

1. “人人富裕矣”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8]的“至暗时刻”，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人民摆脱剥削和压迫提供了思想指南和领导力量。李大钊设想未来社会“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9]，“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10]，即“人人富裕矣”^[11]。针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饥寒交迫的现象，李大钊认为其根源是畸形的社会制度，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拥有平等的生存权和经济权，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才能实现“人人富裕”“人人幸福”。“社会主义使人最大幸福”描绘了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制度构想，在现实与未来的双重关照中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

2. 土地“平均分配”

土地是激发农业大国农民革命主动性与求富积极性的关键生产资料。“打土豪，分田地”不仅是适应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需要，而且是中国共产党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实践口号，《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集中体现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实现土地“平均分配”的早期探索。抗战时期，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发展生产力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通过开垦荒地、发放农贷、减租减息、兴修水利等运动确保军民生活必需品的自给自足，突破了经济上受剥削的困境。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进行了广泛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按人口“统一平均分配”土地，落实“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的政策主张，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平均分配”的土地制度构想。中国共产党着眼于广大农民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以土地“平均分配”得民心、安民心，是共同富裕早期探索的一次成功实践。

3. “大为富”“大为强”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为尽快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富裕就要有工业”^[12]，发挥农业的基础作用、工业的主导作用、国防的支撑作用以及科学技术的关键作用，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13]的必然选择，“四个现代化”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表达，也为共同富裕注入了现代化元素。1953年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冲破农业、农民、农村面临的生产资料短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生产技术落后三重困境，“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4]。毛泽东强调，“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5]，“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16]。“大为富、大为强”的目标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是凝结着共同富裕早期探索智慧的建设方向。

二、共同富裕：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演进

立足于不同的时代方位和阶段性任务，中国

共产党通过理论擘画、实践探索、经验总结，历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创新发展、新时代的具象实践的历史演进，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之路。

（一）初步探索：确立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共同富裕根基

1. 农业合作化：“所有农民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从世情国情出发，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通过带领农民创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生产资料从“私有”到“公有”的伟大飞跃，以集体经济方式实现农民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逐步缩小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在推进“三大改造”的同时，为克服小农经济思想对农业发展的阻碍，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纠正关于合作化的错误认知，增强集体意识，为这一时期的共同富裕探索提供了有效支撑。农业合作化的开展在减轻自然灾害对农业造成损失的同时，革新了农业生产技术，发挥了农业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支撑保障作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缩小了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推动农民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提供了坚实基础。

2. 发展生产力：“农业国的基础上谈不上强，也谈不上富”

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7]。共同富裕必须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基础。工业化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指标，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加快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党和国家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建设方针，充分利用苏联援建的优势完成百余项重工业项目的建设，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以苏联为鉴的基础上，“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8]，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走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道路。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充分说明，唯有解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19]，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才能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3. 坚持按劳分配：“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通过“三大改造”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明确劳动者通过劳动所得提高自身的收入，并在国营企业实行计件工资制和奖励工资制，按照工作的复杂程度以及工人的技术水平实行新的职工等级制度。随着全国经济形势逐步向好，新的工资制度在各地创立实行，形成了以技术、行业、地区、职务为参考标准的按劳分配制度。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避免因个人劳动能力差异造成收入两极分化的局面，党和国家坚持以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了相关社会保障制度，有效降低了贫富悬殊的可能性，为共同富裕的制度建设作出了新的探索。

（二）创新发展：突破绝对平均观念，探寻特色共富道路

1. 先富带动后富：“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

先富、后富、共富，是由我国所处的时代方位和发展实际所决定的中国特色共同富裕必由之路。邓小平针对当时存在的共同富裕就是绝对均衡的错误观念，强调社会主义绝不是人人平等贫困，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以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激发劳动热情，不断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物质生活富裕有了起色之后再考虑“均”的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指出，通过先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提高劳动生产

率，提高生产积极性来增加自身的收入，在实现本地区富裕的基础上带动其他地区富裕。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时要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战略构想，不仅推动全体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突破了绝对平均的传统观念，明确了共同富裕是有差别的共富，并非整齐划一的绝对平均，赋予了共同富裕理论新的时代内涵。

2. 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归根到底是全体人民而非部分人的富裕^[20]。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对贫富差距的担忧，指出，“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21]。共同富裕理论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发挥先富群体的带领和激励功能，推动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坚决避免两极分化，兼顾效率和公平。通过制定均衡发展战略，借助国家的调节和引导，在群体和地区之间进行合理的调节分配，加快贫困地区的生产发展，把贫富差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1992年，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2]。明确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规划了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任务，推动共同富裕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落地生根，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了宝贵的实践探索。

3.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生产力充分发展是共同富裕的现实需求。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坚持公有制经济基础，在经济杠杆的作用下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保障城乡之间各要素畅通流动，减少社会资源的浪

费，促进生产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合理机制，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较于计划经济更具优越性，在提高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资源配置效率、增加社会的整体收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既以政府的积极有为弥补市场失灵，又兼顾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创造大规模社会财富的基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良性循环。

（三）全面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共同富裕新局

1. 全民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全面推进共同富裕进入了新阶段。在绝对贫困问题如期解决后，依托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脱贫攻坚到乡村全面振兴的平稳转型，开辟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新起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强了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区域发展差距逐步缩小，意味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朝着共同富裕迈出了更为坚实的步伐。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全民共同富裕道路的新探索。

2. 全面富裕：“既‘富口袋’也‘富脑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民主法治、文化生活、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更加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23]，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推进共同富裕的侧重点也因时因势进行了调整。“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2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诉求出发，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

力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丰富政治、文化、艺术等精神产品的供给，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共创中凝聚精神力量，带领人民共建精神家园，为逐步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提供行稳致远的内在动力。

3. 渐进富裕：“循序渐进”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新时代深化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发展速度已经远超“三步走”的预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共同富裕作为重大政治问题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将长远目标与阶段目标相结合作出战略部署：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基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党中央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坚持长期性与阶段性的统一，“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的共同富裕原则^[25]，为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目标指向、任务要求和实践路径。

三、共同富裕：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路径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既有现代化的“富裕”共性，也有中国式的“共同”特色。要通过做大“蛋糕”，最大限度提升共同富裕的“政治推力”“物质助力”“精神引力”；要通过做好“蛋糕”，为共同富裕提供创新动能、开放空间、生态底色；要通过分好“蛋糕”，彰显共同富裕的公平性、人民性、协调性。

（一）做大“蛋糕”，夯实共同富裕基础

1. 政治保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26]党的领导是新征程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坚强力量，是带领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一是充分发挥党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发挥党的组织力与领导力，统筹规划、协调推进，确保共同富裕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贯彻落实。二是坚持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党的领导是共同富裕道路上克服重大风险与挑战的关键所在，因此党要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强化使命担当，保持战略主动、战略自信，在共同富裕实践中练就真本领、真功夫，通过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确保共同富裕始终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前进。

2. 经济根基：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是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公有制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国有企业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布局，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影响力，建立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制度。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的重要作用，维护关乎国民经济命脉重要领域的安全性，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安全保障。二是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民营经济为我国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要建设公平竞争、要素流通、依法合法的市场环境，提高民营企业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鼓励民营企业增强治理效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人民创造增收致富渠道，探索从企业富裕到行业共富再到全民共富的实践路径，为实现共同富裕贡献经济力量。

3. 文化支撑：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共同要求，建设“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实现精神富裕的必由之路，也为物质富裕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动力。一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全民凝聚力、向心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动引领，营造学习道德模范的良好社会风气，潜移默化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在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社会风尚中推进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激励全体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不懈奋斗。二是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以“个性化、精准式”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为载体，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创造贴近生活、贴合实际，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从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文化优势有效转化为经济优势，构建高质量可持续的文化发展体系，为实现共同富裕贡献文化力量。

（二）做好“蛋糕”，提升共同富裕质量

1.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共同富裕动能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27]，是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要求。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与核心要素，是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于民的重要手段。一是在顶层设计上，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创新力量，立足世界科技前沿、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攻克核心关键技术，解决“卡脖子”难题，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要发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的力量，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建设，激励领军型人才投入重点领域、关键行业、核心技术的研究工作，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生态。二是在具体实践上，要通过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激发科研创新活力，释放市场经济主体的创造活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氛围。要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方面的新增长，壮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实现共同富裕提质增效。

2.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宽共同富裕空间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一是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创造财富增长新空间。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效应，拓宽“一带一路”在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方面的广度和深度。各地区要合理利用自身优势，加强与相关国家的交流合作，实现资源互补、技术共享、文化互鉴，从而实现国内经济高效率、高质量增长，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二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新发展格局。从国内市场来说，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制度，构建高标准的社会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从国际市场来说，要积极引进全球优质资源要素，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与修改，对接国际市场规则与标准，通过内外联动式发展为共同富裕开辟广阔空间。

3. 走绿色发展道路，绘就共同富裕底色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8]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凝结着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人民美好期待兼具的共同富裕价值理念。一是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快全域绿色转型升级。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通过转换经济增长动能，突破“生态阈值”“资源阈值”和“气候阈值”的约束，从而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态体系，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二是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家园。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体制机制，持续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向纵深发展，继续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通过开展环境质量提升、自然资源保护等攻坚行动，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工程，从而保持生物的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与后劲，为实现共同富裕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环境，实现

生态宜业宜居与生活富裕双赢。

（三）分好“蛋糕”，完善共同富裕保障

1. 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实现分配公平正义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相协调相配套的制度体系，是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重要途径。一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丰富居民收入来源。通过健全最低工资调整机制、建立合理的劳动者工资增长制度，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通过完善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策机制，充分利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益提高收入。二是要完善再分配调节功能，发挥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政府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精准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强化社会保障的兜底性功能，探索转移支付新形式，实现“提低”“稳中”“控高”，进而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新格局，有效应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三是要利用第三次分配作为有益补充，激发社会各类群体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通过建立健全公益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与监管制度体系，大力建设枢纽型、资助型、服务型慈善组织，为自愿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提供规范化、合法化平台，以“温柔之手”促进共同富裕。

2.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进民生福祉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的基本公共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个性化、多元化需求，具备全方位、高质量、可持续等基本特点。一是要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精度”，加强民生福祉制度体系建设。在实现“供什么”量的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供得怎么样”的质的提升。针对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充分利用网络化、信息化手段，优化对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兜底性、基础性、普惠性民生保障，优先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二是要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高度”，实现优质服务供给。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范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

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统筹机制,实现多元协同治理,不断提升服务能力、扩大服务范围,实现公共服务资源有效供给、高效利用,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向“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迈进,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高水平的民生保障。

3.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打造协同合作新格局

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环。一是优化区域互助机制,加快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布局。“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必须长期坚持下去。”^[29]因此,东部地区要主动支援中西部地区发展,在资金支持、人才交流、劳务协作、产业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协作等方面形成互惠互利关系。二是坚持中部高质量发展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打造中西部发展新格局。中部地区要充分利用贯通南北、承东启西的优势地理位置,探索省际协作创新机制,就近融入周边中心城市的发展,打造特色都市圈与城市群,提高区域一体化发展程度。西部地区要发挥“造血”功能,补齐发展短板,通过打造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特色产业园区,将本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深度融合多项区域重大战略,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走好全民共享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参考文献:

[1][2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22、70.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415.
-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874、683.
- [5][6][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436、460、466.
- [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 3.
- [9][10][11]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457、246、276.
- [12][13]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264、189.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569-570.
- [1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1080.
- [16]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495.
- [17][18]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1、218.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293.
- [20][21][2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64、172、373.
- [2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8.
- [24][25]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 2021(20): 4、5-6.
- [27] 习近平.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N].人民日报, 2021-08-18(1).
- [28]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256.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231.

责任编辑:鲍跃华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互动关系研究

张彩云

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的政治文明新形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之间具有相互契合、互相成就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探索、形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力量,推动人民当家作主从理念走向实践,并形成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在与西方民主的比对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的科学性、创造性和全面性。新的征程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一体推进,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有效性。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全面领导;互动关系

《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是党不断推进中国民主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经验结晶”^[1],充分发挥了党的政治引领力、组织动员力、思想凝聚力和社会号召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2]。因此,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提出有效举措,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提升中国民主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

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是探索、形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力量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其本质和核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3]。“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和发展于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不懈奋斗”^[4],中国共产党推动人民当家作主从理念到实践并形成制度体系,在新时代“深化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5]后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

收稿日期:2024-06-08

作者简介:张彩云,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统一战线学博士研究生,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联 2023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项“统一战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效能研究”(2023-TZZX-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理念。

(一)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从理念到现实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矢志不渝追求民主,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奋斗不止。一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为指导探索民主之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启民主探索之路,但是照搬西方制度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以完全不同于西式民主的人民民主思想为指导,重新确定了发展民主的方向,重新定义了广大人民在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当中的地位作用。党的二大就将“民主”纳入使命目标,在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中开辟根据地,致力建设“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6],并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民主政权建设,在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并开展“三三制”民主实践。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7]。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体和政体。二是中国共产党将人民民主的实践发展到全过程。中国共产党推动人民民主从理念走向制度和新的实践,再从实践中总结形成新的理论,特别是更加注重基层民主、创新协商民主、服务社会治理,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价值理念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治理机制和人民的生活方式”^[8]。基于长期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总结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并阐发了一系列理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改革由‘中心’走向‘全面’的结果”^[9]。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深得人心。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民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保障,更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民主理念深入人心、民主实践更是深得人心。数据显示,人民群众对民主政治的参与热情和参与率持

续高涨。改革开放后的12次乡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11次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我国选民参选率均保持在90%左右^[10]。2020年“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上征求意见,人民群众踊跃参与,相关建言在两周内就超过101.8万条,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活动在1个月内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854.2万条^[11]。

(二) 中国共产党逐步构建起科学有效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马克思指出,民主问题实质上是国家制度问题,“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就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12]。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理念建设民主政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井冈山斗争时期探索的“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成为“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起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政权。从抗日战争期间实行的根据地民主政权保障社会各阶级都有发表意见和办事的权利,到延安时期的“豆选法”赋予根据地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选举权利。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代行人大职能,实现各阶层、各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协商建国,到人民政协制度正式形成,奠定了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重要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并写入宪法。改革开放之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开始实施,中国共产党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础上完善其他重要政治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是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核心要素。从国体来看,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民主与专政有机统一。从政体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党通过人大制度使党的主张在法定程序下成为国

家意志，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保障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从基本政治制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之间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新型政党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团结、民主、和谐的本质属性^[13]，保证各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少数民族公民的平等自由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权利，增强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局面。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基层党组织领导支持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基层民主、创新基层民主，不断实现自我管理、服务、教育、监督。

（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党的领导在“两个结合”中保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方向。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14]。党的领导保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在正确的方向上有效运转。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我国复杂国情和革命形势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探索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国内外政治发展成败得失为镜鉴，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动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1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

当家作主更为扎实。可以说，中国发展民主，既“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也“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推进民主”^[16]，彰显了中国的民主特色。另一方面，党的领导統合了“民主新路”和“自我革命”两个答案。中国共产党面对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问题，给出了“民主新路”的第一个答案，即由人人来负责，人人都来监督，才能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并实现长期执政。第一个历史答案就说出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的深层联系。事实也证明，人民民主所激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向好发展，民心所向巩固了党的领导。新时代党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即“自我革命”，并以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民主新路”与“自我革命”这一相辅相成的两个答案，使党的领导和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步实现统合，体现出中国民主政治的优势。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学性、创造性、全面性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特有优势，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人民的真正当家作主，更谈不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17]。在与西方旧式民主的比对当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学性、创造性和全面性。

（一）科学性：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理论指导和组织领导能力

民主的实现离不开先进政党的科学引领。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程中所彰显的科学性，就表现为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坚持科学制度安排、坚持科学完整参与实践。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理论指导。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也是超越西方民主理论的

根本所在。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民主制中一切政治制度都是“为人而存在”^[18]。全过程人民民主把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保证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贯彻到实处，并有力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坚持科学民主的制度安排。民主需要制度的保障，而党的领导使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更加规范化、系统化、程序化，推动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中，党的领导坚持民主与专政有机统一，保证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管理各项事务；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政体，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党的领导“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19]。三是坚持科学完整的参与实践。《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多元途径、渠道和形式实实在在地“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0]。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当中，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贯通起来，始终确保人民真正享有投票权、广泛参与权、监督权，确保参与的连续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持续性，并以民主促进民生发展，全体人民实现全面小康，建成了世界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教育、社保和医疗卫生体系^[21]，完整的民主参与真正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民主绩效。

（二）创造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不仅是对将民主视为西方政治制度‘专属品’的有力批驳，更是对

人类社会民主形态的创新发展”^[22]，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创性贡献。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西方民主实际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资本博弈，竞争型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实现自身利益的民主游戏。列宁曾深刻指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实际上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23]。而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4]，这就决定了我国不是少数人独享的民主，是真正代表最广泛人民利益的民主。在党的领导下，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巨大的民主优势。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更真实的民主。西方民主简单地将民主等同于竞争选举，实际上只是利用人民手中的选票夺取执政权力，人民投票时被唤醒，选举期一过民主就陷入“休眠”的境地。马克思指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民主，无论怎样鼓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实际上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强调，有没有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25]，中国共产党将民主扩展到选举、协商、管理、决策、监督的全过程，实现在科学决策之前、之中与之后的民主，强调民主参与、民主覆盖、民主流程的全面真实。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取得了更高品质的有效性。民主是不是真的有效，是要看民主权利有没有真正落实到人民手里，人民是不是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全方面和民主体系、民主流程的全过程，民主是不是能取得真正的绩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主追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的“政治空转”，具有更高的质量^[26]。中国“从一个被别人瞧不起的穷国转变为中等繁荣的，以及用国际标准来看，非常平等主义的国家”^[27]，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

民主的有效性还体现为“民主是要用来解决人民群众要解决的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导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人民群众深入参与问题的解决过程，拥有实际的“议题设置权”，并总结提炼解决问题所形成的经验做法。例如，浙江诸暨的枫桥镇坚持人民群众的参与，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形成了基层民主的“枫桥经验”^[28]，成为高质量基层民主的代表。

（三）全面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坚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民主自信

“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全体个人’才是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不可分解的人民力量。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人民民主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关键之所在。”^[29]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民主自信之魂”^[30]。巴黎公社曾创设了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性质的政权组织，但这个先驱式的探索最终被强大的反动势力镇压。毛泽东同志认为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31]。苏联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上的探索和经验也说明无产阶级政党不重视民主政治建设会使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遭到严重破坏^[32]。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至关重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从打破西方长期以来的政治话语霸权来看，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民主的成就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自信。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占据着民主政治话语霸权，当前，国际上仍然存在以西方民主、竞争型民主作为唯一标准来评判政治制度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民主为建设方向和目标，在助力提升民生福祉的同时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提升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在取得历史性胜利和历史性成就之时，切实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优势。《乌兹别克斯坦日报》、巴勒斯坦新闻网、《菲律宾商报》等国外媒体都积极评价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意义，认为能从“中国式民主实践中获得启发”^[33]。从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局性视域来看，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与民主实践进行统筹谋划和系统安排；中国共产党庞大且健全的组织网络、规模巨大且素养能力高的党员队伍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组织和人员保证。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有机对接起来，转化为党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从而全面系统地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一体推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党的领导在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和民主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体现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规律。”^[34]新征程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有效途径，党的全面领导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二者一体推进、双向促进。

（一）新时代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如何实现“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广泛性问题，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和国家的“一切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其一切工作部署和工作安排，都应该来自人民，都应该为人民利益而制定和实施”^[35]。

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链条”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相结合。民主在运行过程中是一个聚民意、集民智、合民力的政治实践，包含了各个系统、层级之间的相互配合，需要一套协调整合多元主体的全链条运行机制，实现有效运行，这就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进行总体把握和全面领导，确保党的意志、方针、政策、决策、

原则等贯彻落实到民主政治参与各个环节当中，确保这些链条环节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向前进，保持“人民性”的政治本色。例如，在民主监督中，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党内监督的同时，领导发挥人大、行政、司法、审计、社会等多方监督力量，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的工作格局。又如，在民主协商中，中国共产党统筹推进人大、政党、政府、政协等七种方式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强化政党协商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两种政治协商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个多环节相互衔接和多部门协同配合的复杂的民主实践过程”^[36]，为实现多环节有序贯通、多层次有序联动、多部门有序合作，必须要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方位”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相结合。党的领导从来不是局部的、片面的，而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即党的全面领导要体现在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落实和体现在涉及人民民主的层次、程序、形式、渠道、过程等全方位，同时要突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重要作用。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方位，既重视动员和选举，又重视管理和反馈，既重视民主决策前的意见采纳又重视民主决策后的建议^[37]。为充分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必须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为广泛的民主主体、多元的民主形式、有效的民主程序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对立起来，更不能用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来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38]。

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覆盖”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相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39]，使民主建设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领域，这就要处理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覆盖”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是相互贯穿的，而在中国共产党各个阶段的总体布局当中，“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发挥着核心的作用”^[40]。“全覆盖”同时要求覆盖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等不同群体类别，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41]。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能够“真正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42]。

（二）新时代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性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性与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相结合，就是解决是否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需要从制度体系、渠道平台、政治文化等具体举措中创新推进。

一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建设。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为了保证参与的群体、角色、周期、领域等实现全面化、多元化、制度化和广泛化，让“全体人民（不是部分群体）、以不同角色（不是单一角色）、常态化（不是时断时续）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等广泛领域（不是某个领域）”^[43]。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对制度体系的统筹谋划、整体设计和实践部署。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要以党的全面领导推动人民通过各级人大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和任免权，更好处理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要以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能够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的重要职能。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要以党的全面领导保障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形成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要以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人民群众更好地

享有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权利。

二是党领导下的民主实践平台渠道建设。渠道平台是人民现实地、具体地参与民主实践的条件，在党的领导下，民主平台载体的多元化、便捷化、参与度不断提升。新征程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平台要更加体现政治性。例如，把人民政协平台打造成为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团结奋斗的重要渠道，把爱国统一战线作为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吸收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力量的重要平台。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平台也要更加大众化。互联网的普及使微信、微博、短视频等大众平台运用越来越广泛，打通线上线下平台渠道需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例如，湖南的政协云这一“互联网+政协”平台，通过网络微提案、微建议、微社情民意信息，成为打通委员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创新载体。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平台还要更加智能化。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5G 信息技术等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借助区块链技术等智能技术来激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44]。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宣传部门、工信部门的力量，促进人大、政协、基层党组织共同开发智能化平台，使民意表达与收集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更加便捷、更加精准、更加有效。

三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文化培育建设。政治文化的培育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文化基础，要培育与人民民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首先，党内民主建设可以引领和涵养良好的民主氛围。各级领导干部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形成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意识，能够有效激发他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员干部在党内民主生活中汇总形成的观念、习惯、作风、传统等，也会通过工作和生活引领社会日常民主风气^[45]，培育民主新风尚。其次，要加强民主教育。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民主教育是培养政治文化的重要举措，要通过国民教育、党性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多种方式，使人民群众进一步涵养民主素养，养成自

觉的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转化为具体实际的民主参与行动。最后，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民本思想是我国民主发展的文化基因。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等文化精华和价值观念当中，就蕴含了人民民主的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46]。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中既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又彰显了中国民主特色，实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因此，我们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将人民民主的文化根基传承好、发展好、运用好，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三）新时代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性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解决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效果问题，就是要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性与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相结合。党的领导“统帅着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公平正义、民主政治等社会主义基本特征”^[47]，能够产生民主绩效。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产生重大政治效能。一方面，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加强党的领导，能够推动党内民主政治环境的良好发展，政治效能首先体现在以党内民主建设引领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上。党内民主建设经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可资借鉴的样板，党内民主依存于人民民主当中，直接影响人民民主的发展状况，党内民主建设推动形成良好的民主氛围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有益因素。不断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深化党内选举制度，优化民主测评制度，严格落实民主生活制，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环境，有利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另一方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更加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产生巨大的政治效能。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厚植党的领导的民意基础，“使党的决策更加科学，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得更加彻底、执行得更加有力”^[48]，从而更加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

执政基础。人民群众始终拥护党的领导,《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就指出,“近年来,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每年都保持在90%以上”^[49]。

二是坚持党的领导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产生重大经济效能。马克思谈到取得自由的条件时就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50],因此,人民民主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51],发展生产力与争取民主是前后贯通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当中,将民主制度、民主程序转化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效能,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民性的本质能够确保人民民主不会偏离人民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总体目标,也不会受到资本利益集团和地方利益集团的侵蚀,从而致力于创造更加平衡和均等的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将发展动力、发展信心与发展绩效三者有机结合”^[52],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发挥出人民群众的历史动力,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三是坚持党的领导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产生重大社会效能。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能够推动构建健康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党群关系、政社关系、政企关系,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合力。中国的民主是中国之治的“密码”,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尊重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等民主要求贯穿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不断深化对中国政治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推动中国政治制度优势不断向国家治理效能有效转化”^[53]。全过程人民民主蕴含着“以民主促民生”的价值导向,就要“将民主建设与民生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追求民主化的民主绩效”^[54]。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就要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发展人民民主,特别是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强调人人参与、共治共享,通过基层民主协商、民主管理等途径,畅通规范人民群众意见诉求表达渠道,加强预防调处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此外,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探索新路径的同时,也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55]。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与实践,彰显了中国民主的智慧,因而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故事,将为民族复兴大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 [1][4][5][8][10][16][19][25][28][49][5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民主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7、7、1、37、25-26、50、16、2、21、47、51.
- [2][3][21][39][4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7、37、11、26、18.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八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649-650.
- [7]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75.
- [9] 佟德志.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复合逻辑与全面发展 [J]. 政治学研究, 2023(2): 39-48.
- [11][48] 仲音. 坚持党的领导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在统一——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N]. 人民日报, 2022-08-05(4)、(4).
- [12][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41、40.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8.
- [14]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359.
- [1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66.
- [17][26][43] 王红艳. 党的领导: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证 [J]. 探索, 2022(3): 61、61、65.
-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8.
- [22] 戴立兴, 张莉.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J]. 前线, 2023(6): 19-21.
- [23] 列宁选集: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50.
- [2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95.
- [27] 施韦卡特. 反对资本主义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88.
- [29] 徐楷森.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1): 35-44.
- [30] 张峰. 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民主自信之魂 [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1): 1-10.
- [31] 毛泽东文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5.
- [32][34][53] 陈开菊.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意蕴 [J]. 甘肃理论学刊, 2021(6): 15、13、17.
- [33] 朱文博.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传播效果与经验启示 [J]. 青年记者, 2022(23): 68-69.
- [35]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100-101.
- [36][45][47] 陈爱萍. 党的领导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证 [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5): 19、22、21.
- [37] 刘刚. 党的领导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 [J]. 政协天地, 2022(12): 40-41.
- [38][41] 习近平.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44、58.
- [40] 严强, 胡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政治民主诉求 [J]. 政治学评论, 2022(1): 65-82.
- [42]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问答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5.
- [44] 高奇琦, 杜欢. 智能文明与全过程民主的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 [J]. 社会科学, 2020(5): 25-35.
- [50]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节选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95.
- [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2.
- [52] 唐亚林. 党的领导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证 [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1(7): 33-36.
- [54] 林尚立. 民主与民生: 人民民主的中国逻辑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1): 112-122.

责任编辑: 王天海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保障与改善民生的价值理念、本质要求与实践进路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重要论述的文本分析

师 洋 陈 思

摘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的重要论述为研究对象,探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保障与改善民生所蕴含的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前提的价值理念,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与精神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要求,以及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持续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加快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六大实践进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的重要论述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保障与改善民生提供了理论遵循,也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民生发展智慧。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民生;文本分析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围绕保障与改善民生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2]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保障与改善民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的重要论述为分析对象,基于“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选取与民生高度相关的1162段文本进行文本预处理,随后针对预处理的文本进行特征提取并进行共现分析,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见图1)。根据共现网络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保障与改善民生的价值理念、本质要求和实践进路。

收稿日期:2024-05-19

作者简介:师洋,上海市委党校硕士研究生;陈思,上海市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部副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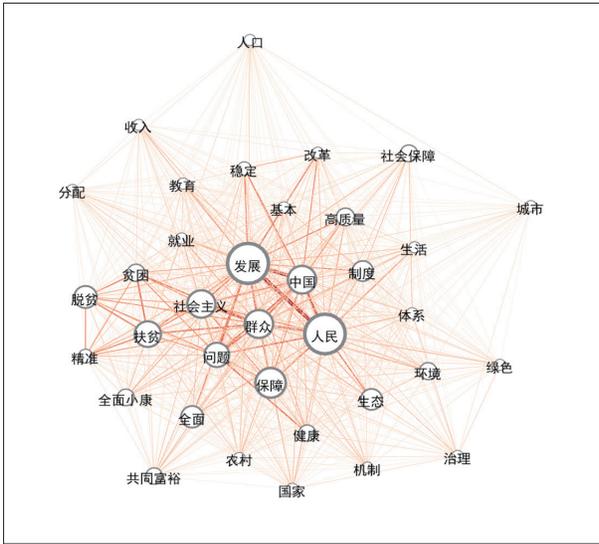


图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重要论述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保障与改善民生的价值理念

根据文本分析结果可见，“人民”与“发展”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重要论述的两大核心价值理念，且二者之间也高度共现，共现值为 1253。谈及民生，绕不开“人民”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通过发展着重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保障与改善民生方面具体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和以高质量发展为前提的价值理念。

（一）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1]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品格。“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4]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保障与改善民生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秉

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保障与改善民生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层次不断提高。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在以更大力度补齐短板改善民生、以更实在的措施解决好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现实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6]，在现代化民生建设中，要不断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第二，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保障与改善民生的根本目标。同样，“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7]。马克思曾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共产主义追求的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信念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党的领导下必须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使其最终表现为人的现代化，保障与改善民生的目的也在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关注人的根本利益。

第三，以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创造作为保障与改善民生的依靠力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创造是保障与改善民生的重要依靠力量。亿万人民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参与者，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力量。依托人民的力量、尊重人民的创造性，汇聚人民的智慧与能量，可以有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进步。保障与改善民生，需要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通过把握人民意愿、回应

人民关切、尊重人民权利等方式，增进人民福祉，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从而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尤为重要。通过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重视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使改革和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群众。

（二）以高质量发展为前提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生产力发展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基础性地位，强调“发展是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8]。高质量发展为保障与改善民生提供可靠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下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跳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误区，转向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就要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进一步为民生改善打牢坚实基础^[9]。

第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只有通过持续的创新，才能不断提升生产力水平，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竞争力。创新不仅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还创造了大量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提升了劳动者的技能和收入水平。通过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我们能够提供更多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

第二，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旨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通过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以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协调发展意味着更加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从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三，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是提升人民生活质

量的重要举措。通过减少污染、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绿色发展为人民创造了更加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绿色发展还促进了绿色产业和绿色消费的兴起，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进一步推动民生事业的改善与发展。

第四，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发展强调增强内外联动性，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和效益；同时，开放发展还推动了文化交流和人文合作，拓宽了人民的视野，提升了文化自信^[10]。通过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引进先进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提升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经济效益，最终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对多样化、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提升生活质量。

第五，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共享发展理念要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让每个人都能在发展中受益。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教育公平和医疗保障，增强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共享发展不仅体现了公平正义，也增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只有实现共享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谋幸福”，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保障与改善民生的本质要求

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是探讨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认为，所有社会都遵循相同的发展轨迹，经历相同的发展阶段，朝向相同的目标进展。目前社会间的差异，仅仅是因为它们在同一进化路径上处于不同的位置，其中典型的理论就包括帕森斯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即社会发展经由原始社会、中间社会向现代社会连续统一的渐进过程。罗斯托提出了“罗斯托路径”的概念，认为经济发展存在唯一的世界性道路，必须经过特定的发展阶段，这条道路被概括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起飞前预备、起飞、迈

向成熟、高度大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

不难看出，经典现代化理论往往采取线性逻辑，认为社会是由低级走向高级，由劣走向优。同时，将“现代”等同于“先进”，“传统”等同于落后，形成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并且都相信一种发展道路趋同论，即这条趋同的道路是西方道路。艾森斯塔德直言，“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经典现代化理论把“现代化”简化为“西方化”。但从二战后的世界政治史可以看到，第三世界后发国家并没有因为建立类似西方先发国家的制度体系而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中国的和平发展则进一步破除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窠臼。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基于中国基本国情与现实发展，走出的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就要将中国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去思考。

（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西方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具有显著差异。西方现代化主要依赖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殖民和掠夺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过程中，财富主要为少数资本家所享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发展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这种矛盾现实表现就是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西方现代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少数人的利益，无法解决资本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从而导致了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其目标追求是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强调全民共享。这一现代化路径强调社会主义性质，注重公平正义，旨在缩小贫富差距，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强调发展

的普惠性和可持续性，以及全体人民应有机会和能力均等地参与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共享发展成果。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使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效率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公平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首先在于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在此基础上，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的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既要提高社会财富的整体水平，又要确保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使每个人都能分享发展的红利。通过推动社会公平与正义，缩小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这要求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让全体人民在共享发展成果中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全球现代化视角下，不同国家现代化起步时间存在差异，作为后发国家也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可以实现后来者居上。先行现代化的国家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包括制度和技术的不断试验和改进，这一过程中充满了试错和失败的风险。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学习这些先行者的经验，避免重蹈覆辙，从而大幅减少现代化的探索时间和成本。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充分借鉴了欧美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汲取了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教训，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弯路。尤其是在环保方面，先发国家现代化属于串联式，先污染后治理，造成许多不可挽回的生态损失，而中国充分吸收了经验教训，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生态保护的并联式现代化道路。

自然环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环境就是民生”。在现代化民生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推行绿色、可循环、低碳的发展路径，执行以节约为先、保护为重、自然恢复为主的生态民

生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集中治理了一系列人民群众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显著改善了民生福祉。在蓝天保卫战中，通过加强对工业排放的监管、推广新能源汽车、改善城市交通等措施，显著改善空气质量。在水污染治理方面，通过实施河长制和湖长制、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措施，逐年改善全国主要江河湖泊的水质。在农村环境整治方面，通过推进“厕所革命”、建设农村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措施，显著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三）物质与精神相协调

中国崛起的形态不同于传统的民族国家。中国的崛起不是仅仅依靠民族主义，而是包含了深刻的阶级革命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可见，中国不能被简单地视为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而应从其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进行理解。中国具有超多人口、超大国土、超长历史、超长文化血脉，是一个历经千年不衰的文明型国家。这种国家形态具有强烈的文明和政治向心力，其政治管辖范围与文明辐射范围高度重合，是“一种‘文明向心力’和‘政治向心力’同频共振、同向聚合的共同体”。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始终注重文化认同、文脉赓续和文明传承。

与之相对，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危机，集中体现在人的异化现象上。劳动者在单调、重复的工作中失去了对劳动过程和成果的控制，劳动异化削弱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和个人价值感。消费异化使人们在过度追求物质享受中忽视了内心的精神需求，导致内心的空虚和不安。自我异化使得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和成功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心理上的矛盾和冲突加剧，精神健康受到严重影响。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导致社会信任度下降，互信基础被逐渐削弱，人际关系变得功利化和疏远，社会凝聚力和稳定性大大削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道德和伦理标准常常被经济利益所取代，道德价值的丧失和伦理危机频繁发生，商业欺诈、环境破坏、社会不公等现象层出不穷。这些现象不仅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秩序，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信任和不安定。文化异化使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受到破坏，文化产品的商业化和同质化削弱了文化的内在价值和精神内涵，导致社会成员难以找到共同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冲突。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物质文明的建设，更强调精神文明的发展，认为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充实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不可忽视，但中国始终坚持文化自信，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文化自信不仅体现在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和自豪感上，更体现在对文化发展的积极推进和创新方面。因此，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加强文化领域的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精品，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保障与改善民生的实践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如何保障与改善民生”的重要问题。“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1] 本文基于文本分析结果，探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六大实践进路——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持续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加快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一）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学有所教”是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民生问题，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

首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指南针。要确保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必须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教育方向正确、教育政策得当。具体措施包括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教育资源均衡分配，提高教育公平性，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其次，巩固义务教育成果，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必须确保其质量和覆盖面。近年来，通过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计划”，城乡教育差距显著缩小。未来，需要继续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优化城乡学校布局，提升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推动城乡教师交流轮岗，确保农村孩子也能享受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资源。再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协调保障职业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途径。要进一步提升高校办学水平，加强学科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动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增强科研创新能力。与此同时，要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和办学水平，使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支撑。最后，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继续教育持续发展。教育体制改革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要积极探索

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破除“唯分数论”，树立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推动“全民终身学习”，构建学习型社会。鼓励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和在线教育发展，为广大群众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不断提升全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二）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就业不仅是民生之本，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推动高质量的就业。

首先，强化就业优先政策至关重要。政府必须将就业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出台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鼓励各类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中小企业在吸纳就业方面具有灵活性和创新性，是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力量。同时，健全劳动市场监测预警机制，及时解决就业中的矛盾和问题，有效应对就业波动，保障就业稳定。其次，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手段。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网络，可以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精准、高效的就业服务。特别需要关注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通过制定专项支持政策，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帮助他们顺利融入劳动市场，这不仅有助于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还能提升社会整体就业质量。同时，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实现就业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措施。此外，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完善职业培训体系，提供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能够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加大对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人才培养力度，满足经济结构调整对新技能的需求。最后，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根本。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进而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在新形势下，研究制定适应新形态的劳

动保障政策，确保灵活就业者和新兴就业形态从业者的权益。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收入是民生之源，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分配制度是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政策，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既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政策制度，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保持同步，收入结构不断改善，城乡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这些成就不仅体现了改革的有效性，也为下一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在新形势下，分配公平仍面临诸多挑战，必须全面深化分配制度改革。首先，构建完善的分配体系是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有助于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其次，提高居民收入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目标。通过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此基础上，通过工资、税收等方式合理分配收入，增加中低收入群众的要素收入和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实现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有机统一。再次，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同样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清理不合理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确保收入分配公平公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税收调节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利用税收实现收入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最后，支持公益慈善事业也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

方面。引导和支持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教育、医疗救助等公益活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从而有效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四）持续加强社会保障建设

持续加强社会保障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和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保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覆盖面，确保更广泛和公平的制度安排。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等多个方面。这一体系强调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惠及更多群众，确保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制度的公平性体现在覆盖范围的广泛性和保障水平的提升上，使得每一个公民都能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受益。在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借鉴了国外的有益经验，立足国情并探索创新，建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稳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得社会保障政策能够迅速出台并有效落实。加强党对社会保障工作的领导，确保了政策的落实和体系的健康发展，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人民至上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保障事业的根本目标。围绕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目标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确保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通过不断完善各项社会保障措施，确保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备性和可持续性。通过改革和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社会保障事业前进，提高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应基于经济和财力的可持续增长，科学规划，合理安排，确保社会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这些措施，中国正在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基础。

（五）加快推进健康中国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12]《“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擘画了健康中国的远景目标和行动纲领。这些规划纲要和行动计划明确了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和路径，力求解决就医难、就医贵问题，兑现“病有所医”的承诺，切实保障人民的健康权利。

首先，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关键。加强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建设公共卫生体系，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确保全民健康安全，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通过增加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特别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能够有效提升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其次，加强健康教育是提高全民健康素养的有效手段。通过广泛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可以在全社会形成注重健康的良好氛围，从而预防疾病的发生和传播，提升国民健康水平。再次，深化医疗体制改革、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医疗服务效率、降低医疗成本，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根本途径。通过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有效缓解人民的就医压力，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最后，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提升服务能力，促进中医药现代化与现代医学融合发展，能够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和治疗中的独特优势。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需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支持，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应共同参与，形成合力，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六）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重要的民生福祉，具有广泛的普惠价值。在社会迅速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

条件持续提升的今天，人民群众对优质居住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发展民生面临的重要问题。

第一，新时代保障与改善民生要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满足人民长远利益的需要。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态产品。第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和法治保障。要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第三，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强绿色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第四，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提升生态环境质量。通过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承载力。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改善环境质量，确保人民群众享有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和安全的土壤。第五，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提升全民生态文明意识。通过广泛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倡导生态文明理念，提升全民生态文明意识。加强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培养青少年的生态文明观念和行为习惯。

四、结语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保障与改善民生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在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中的，走出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民生发展道路。保障与改善民生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旨在建立人民能平等参与并共享共建的社会发展架构。这种模式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等多个领

域推动了社会的全面变革和进步，而且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更符合实际、更有活力、更公正合理的社会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中国式现代化, 民生为大 [EB/OL]. (2024-04-23).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4/content_6947081.htm.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6.
-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171.
- [4]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8.
- [5][12]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9、39.
- [6][7] 习近平. 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3年合订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7、7.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9.
- [9] 金耀武, 李精华. 习近平关于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探析 [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3(5): 107-115.
- [10] 王德蓉, 窦道琴.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J]. 党的文献, 2023(3): 18-26.
- [11] 习近平.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03-21(2).

责任编辑: 蒋建忠

高校思政课教学媒介变迁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王志强

摘要:教学媒介是保证思政课教学效果的重要支撑。回顾历史,从传统型教具到视听型媒介的应用,从多媒体辅助教学到网络资源的引入,从运用新媒体到智能化融媒介格局的形成,思政课教学媒介随时代发展经历了重大变迁。思政课教学媒介在演进变化过程中呈现出党和国家始终高度支持、传统型媒介变化为交融性媒介、“课堂之中”走向“课堂之外”、同一化向个性化模式转变,以及从重视“物”转向关注“人”等特点。厘清高校思政课教学媒介的发展脉络,对于加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思政课;教学媒介;高校

思政课教学媒介是思政课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运用的各种载体和工具。从广义上看,思政课教学媒介包括教学活动开展的一切因素和条件;从狭义上看,思政课教学媒介是指在教学信息获取、存储、传输和反馈等环节中所使用的载体及其技术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深刻展示了世界发展的前景”^[1],“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在高校思政课教学历史中,从粉笔头到 PPT 课件,再到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教学媒介

经历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全面回顾和梳理高校思政课教学媒介变迁历程,探究其特点、规律和启示,对于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教学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思政课教学媒介的变迁历程

媒介一词,从词源上说,最早源于先秦时期的婚姻介绍人,《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中》记载,“和(王和)养姑守义,蜀郡何玉因媒介求之”,后延伸为“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旧唐书·张行成传》记载,“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3]。20 世纪中后期,西方理论界对媒介的理解进一步

收稿日期:2024-07-15

作者简介:王志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0 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新时代思政课教师教学媒介应用与媒介素养培育研究”(20JDSZK006)、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红医文化资源融入医学院校思政课教学研究”(2024SJSZ03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延伸和拓展。除联系物和“中介”之义外，媒介还用以指称信息传播渠道、大众传播媒介、媒介组织等。美国学者施拉姆认为，媒介是“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递的工具”；加拿大现代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将媒介作为人体的神经和器官的延伸物对待，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其余一切媒介（尤其是机械媒介）是人体个别器官的延伸”^[4]。从教育领域看，任何教学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教学媒介的应用，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发展包含教学媒介的变迁。

（一）从传统型教具到视听型媒介的应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重建和社会改造的不断推进，高校思政课的建设逐渐提上日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5]这为高校思政课建设提供了依据。

传统型教具是与现代化教学媒介相区别的，是在课堂教学中所使用的教学用具，包括黑板、粉笔、教科书、绘本、标本、图片和简易器材等。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技发展状况，当时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媒介主要以教科书、粉笔、黑板等传统型教具为主，课堂是主要的教学场域，课堂教学是主要方式。早在1949年上半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在党的领导下开始推进课程改革，燕京大学先后添设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中国社会史、历史哲学及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党史等新课程^[6]。新中国成立后，各高校政治课的主要学习方式是课堂讲授、上政治大课（听报告）、组织学习班等，而运用到的教学媒介主要有参考书、报纸、参考资料以及参观实习等实践活动。例如，北京师范大学通过增购参考书、订《人民日报》、在阅览室陈列与政治课教学单元相关的参考资料等方式辅助政治课

学习^[7]；中国人民大学通过理论讲授、作业实验、参观与生产实习等方法，使所学的理论得到透彻的理解和实际运用^[8]。显然，这些传统型教具大多属于教学活动中必备的资料、材料和物理条件，较难推动教学内容特别是政治理论形象化、生动化展现，教学形式以“面对面”交流为主，教学手段比较单一。

视听型媒介是指通过“视”与“听”结合的形式传播信息的媒介，包括电影、电视、广播等。这些媒介较之于传统型、物理型教具，更具生动性和传播力。随着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高校逐渐将广播、电影等视听型媒介运用到思政课教学活动中。从1950年3月开始，为了配合高校思政课教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定期开办学习讲座，针对“新民主主义论”这一门政治课程中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讲解。为办好这个广播节目，教育部专门邀请诸多知名学者进行讲授，同时，天津市广播电台等多家广播电台同时联播^[9]。北京师范大学广播站配合学生们的政治课学习，设置“学习时间”栏目，介绍学习经验^[10]。除广播外，北京市专门建立了教学电影放映队，开展相关学科的电影教学，1960年至1963年先后为150余所学校放映电影12000场，330万人次观看^[11]。

总体来说，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巩固、社会建设的需要，党和国家在高校思政课教学方面，关注的是教学内容的全面、准确和深入，而非教学媒介和方法的运用。从全国范围来看，思政课教学的主要媒介仍以传统型教具为主，这一状况延续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二）从多媒体辅助教学到网络资源的引入

20世纪中后期，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育领域，“PPT+电脑+投影仪”的“演示性”新媒介组合形式，逐渐取代了传统胶片和幻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教育媒介的现代化，也掀起了教育场景和教育方法的新革命。针对这一潮流，邓小平在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上指出,“要制订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比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举办各种训练班、进修班,编印教学参考资料等,大力培训师资”^[12]。随后,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也逐渐开始引入更多现代化的教学媒介。1980年3月至4月,教育部电教局发出《关于运用电教手段加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充分发挥电教手段的优势,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各地、各级电教机构积极组织力量,利用幻灯,电影、录音、录像等手段,为政治理论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形势任务教育等课程提供形象化的教育材料。为配合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共党史课的教学,教育部组织了11所高等院校的中共党史教师和电教人员,制作中共党史电视录像教材,在高等院校教学中试用。在此过程中,多媒体辅助教学已经逐渐走入高校课堂,多媒体教室成为高校思政课教学设施更新、建设的主要方向。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现代信息技术对思政课教学的影响也不断增强。2000年9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培养一支既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熟悉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又能较有效地掌握网络技术、熟悉网络文化特点,能够在网络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队伍。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要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牢牢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权^[13]。之后,全国各地高校思政课开始积极运用互联网资源开展教学活动,互联网的资讯、舆论热点和相关问题逐步成为高校思政课课堂必不可少的部分。

2005年,中宣部、教育部提出了新的思政课设置方案,即“05方案”,要求全国高校大力推进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教学手段

现代化,并强调建立教学资料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14]。“05方案”实施后,思政课教学工作更加规范,各种针对思政课教学的辅助工具和媒介纷纷进入课堂。这一时期,现代信息技术与思政课教学逐步融合,除多媒体辅助教学课件的普及之外,思政课教学的网络资源不断丰富,教学资料数据库纷纷建立。

总之,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媒介进入快速发展和更新换代阶段,多媒体辅助教学逐渐普及,网络资源不断引入。但这一时期高校思政课对互联网的运用,还仅仅将其作为信息获取工具、教学案例来源等,思政课未能有机融入网络空间,思政课程网站规模小、影响力弱。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信息技术与思政课教学的融合主要体现为“网络信息进入思政课”,而非“思政课进入网络空间”,网络是作为思政课“资源”而发挥作用。

(三)从运用新媒介到智能化融媒介格局的形成

进入新时代,新媒介新技术快速发展,思政课也开始全面广泛运用线上线下等多种新媒介。2013年,教育部社科司要求各高校加快筹建高校精品视频公开课和精品资源共享课。2014年,教育部社科司明确提出,加强高校思政课程网站建设,努力为高校思政课教师准备更多优质教学资源。2015年,《普通高校思政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提出:在推进统编教材编写使用的基础上,编写涵盖纸质和数字化等多种载体,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相统一的立体化教材体系;形成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相互支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建设一批名师名家网络示范课。2016年,教育部社科司要求继续组织“同上一堂网络思政课”活动,开发思政课在线课程,建设思政课教学科研文献共享资源库建设。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传统的思政课逐步走向“大思政课”,新的媒介技术在思政课教学

中得到广泛运用。2014年,思政课开始在慕课上播出;2015年,“微课”等教学方法得到广泛运用。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诸多高校运用慕课、网络课堂等方式,使线上与线下相配合,真正实现了“翻转课堂”。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思政课教学媒介更新换代逐渐加快,诸如VR、AR、MR、人工智能等更多新兴技术开始不断进入思政课课堂,这些新技术在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和有效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微信公众号、抖音、B站等社交媒介被充分利用,成为思政课教学活动拓展的新空间和场域。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最可爱的人》《逃出大英博物馆》等网络作品,以青少年喜爱的新型思政教育形态和方式迅速“出圈”,得到广泛传播。当前,在算法推荐工具赋能下的智能化融媒介技术逐渐运用到思政教学中,将人、机器、网络、社会和思政教育紧密对接,人机交互模式发生革命性变化。思政课教学不再局限于课堂和学校,而是融入各类媒介及其信息之中;思政教育不再是单向度理论灌输,而成为交互性、对话性的多向度传播;互联网和电子机器不仅是提供信息的工具,还是引导、教育人的新“教师”。

总体来看,从运用新媒介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到智能化融媒介格局的形成,思政课教学媒介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思政课教学活动的场域和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思政教育渗透到学习生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极大提升了实际效果。

二、高校思政课教学媒介变迁的特点

从传统型教具到视听型媒介的应用,从多媒体辅助教学到网络资源的引入,从运用新媒介到智能化融媒介格局的形成,高校思政课教学媒介随技术进步而不断更新发展,教学内容与形式不断适应着新媒介,新媒介也形塑着新的教学样态,体现出一系列鲜明特点。

(一)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高校思政课教

学媒介的更新和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和支持。回顾高校思政课教学媒介变迁历程,党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始终是思政课教学媒介更新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作为教学的工具,教学媒介在运用过程中离不开正确的价值引领,而党的领导正是确保思政课教学媒介正确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在党的领导下,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与形式实现高度融合,教学媒介服务课堂的实效性显著增强,党的创新性理论成果在新的教学媒介下得到广泛宣传。可以说,党的领导保证了思政课教学媒介变迁的正确方向。

(二) 由传统型媒介变化为交融型媒介

高校思政课教学媒介历经了从黑板、粉笔、语言描述到电影、电视等视听媒介,再到多媒体计算机和互联网,最后到大数据分析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演变过程。这一变迁过程,从来都不是新旧教学媒介之间的相互取代,而是传统的与现代的融合发展。从当前思政课教学实践之中可以发现,传统媒介与新型媒介不存在“落后”与“先进”之分,只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场景下运用的不同媒介样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思政课教学媒介逐渐从传统型走向交融型,实现从单向灌输型方法向双向交流型方法、从单一载体向多维载体的转变。可以说,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的交融式发展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不同的思政课教学内容能够突破过去有限的教学表现形式而呈现出更具感染力、影响力的教学效果。

(三) 由“课堂之中”走向“课堂之外”

互联网时代,传统的课堂教学不断向网络空间延伸。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学习环境不再限制在课堂之内。除了课堂中的教学媒介外,课堂之外的一切事物均可作为媒介来应用。《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强调,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建设“大课堂”。建设思政“大课堂”就是要深入挖掘社会中各种思政元素,运用这些生活化的教学载体巩固学生在思政“小课堂”中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从而实现“思

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高效结合。教学媒介的场景变换打通了立德树人“最后一公里”，推动思政课更好实现入脑、入心、入行。

（四）由同一化向个性化模式转变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思政课教学媒介在应用上只能面向同一化的教学对象，这影响了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效果。随着更多新兴教学媒介技术的出现，思政课教学的物理环境更具多样化、个性化。智能化设备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就是一个鲜活案例。该媒介在思政课教学中能够突破地理空间位置的限制，通过数据的整合与分析，了解不同学生的特点，从而制定出个性化的教学方案。这样一种定制化、个性化的教学媒介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需求，让思政教育达到活起来的效果。

（五）从重视“物”转向关注“人”

思政课教学对教学媒介的应用，在早期主要强调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将教学媒介仅作为工具，工具的更新倾向于工具理性视域中的新方法，而随着新媒介的发展，教学媒介越来越注重“人”在媒介应用中的感受和认知。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和分析“人”本身。更重要的是，教学媒介对“人”的重视并非单向度的，而是涵括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两个维度。在运用教学媒介的过程中，不仅关注如何运用各种手段开展思政课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灵活性和实效性，而且注重教育者如何掌握教学节奏、丰富教学内容、拓展教学形式。

三、高校思政课教学媒介变迁的当代启示

高校思政课教学媒介变迁内在反映了我国思政课建设的演进逻辑。厘清我国思政课教学媒介的发展脉络，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思政课教学媒介建设，从而推动新时代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始终坚持党对思政课的全面领导

在思政课教学中，党的领导是对教学内容设置、教学方式和教学媒介运用等的全面领导。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必须始终坚持党

的领导。党在思政课教学媒介中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就思想领导而言，思政课教学媒介作为一项技术，其首要的任务是将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全面、完整、灵活地展示出来。在此过程中，为应对一些新兴媒介市场化、网络化、娱乐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高校思政课教学媒介的运用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自觉抵御错误思潮的影响，牢牢守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发挥新兴媒介对思政课的积极作用。就组织领导而言，党的全面领导体现在高校党委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和指导。高校党委应扛起政治责任，全面领导高校思政课教学工作，在思政课教学媒介的应用上把方向、管大局。

（二）加强新媒介技术运用

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不断迭代更新，新媒介自我进化加快。新媒介作为保障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工具和手段，理应在思政课教学中得到充分运用。目前，高校开始重视新媒介技术应用，不断推进新媒介教学硬件建设，但依然存在一些较为普遍的问题。例如，在课堂教学设备方面，“投影+幕布”等传统电子化设备占据主流，“电子白板”“电子屏幕”等新一代媒介尚未得到广泛运用，部分高校课堂教学场所没有互联网连接设备，无法开展网络教学，新媒介技术与思政课教学尤其是课堂教学的融合不够，进而无法发挥新媒介技术的优势。对此，要重视新媒介发展的技术更新，加大硬件投入，积极推动思政课教学与新媒介技术融合，在思想政治引领、舆论宣传等方面发挥新媒介的巨大作用，更好地让高校青年学子易于接受、乐于接受思政课教学内容。

（三）提升思政课教师新媒介素养

新媒介与思政课教学的融合，需要教师具备必要的新媒介素养。在当前的思政课教学媒介运用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不愿、不会运用新媒介开展教学活动，主要体现在习惯使用传统媒介、新媒介技术应用水平不高、借助新媒介与学生交

互的能力不足等方面,从而影响教学效果;二是过分依赖新媒介,主要表现为以形式替代内容,存在教学形式化、泛娱乐化等问题,从而偏离了正常的教学目标。对此,需要系统加强思政课教师的新媒介素养。一方面,要积极引导部分教师克服对新技术运用的“本领恐慌”,改变他们对新技术运用的抵触心理,让他们正视新技术的积极作用,主动拥抱新技术。另一方面,要加强教师新媒介运用的系统培训,让他们了解新媒介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特点和传播规律,客观认知相关新兴技术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掌握高效使用新技术的方式方法,正确处理好新媒介技术手段与思政课教学内容的辩证关系。总之,要建立系统化、多样化、长期化的培训体系,全面提升思政课教师的新媒介素养,进而发挥新媒介在思政课教学中的最大增量作用。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17.
-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78.
- [3] 陈至立. 辞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22:

1529.

- [4] 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3.
- [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N]. 人民日报, 1949-09-30(2).
- [6] 陈泓. 北京各大学的课程改革工作[N]. 人民日报, 1949-10-17(4).
- [7][10] 师大同学重视政治学习 改进学习组织和学习方法[N]. 人民日报, 1950-04-16(3)、(3).
- [8] 胡锡奎. 介绍中国人民大学[N]. 人民日报, 1951-01-23(3).
- [9] 教育部高教司举办广播讲座[N]. 人民日报, 1950-03-31(3).
- [11] 南国农. 中国电化教育: 教育技术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 42.
- [12] 邓小平.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1978-04-26(1).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184.
- [14] 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05(4): 34.

责任编辑: 吉强

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对象化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

单 璐

摘要:黑格尔的劳动对象化理论以否定辩证法为基础,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关系的观点集合。本文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揭示了马克思针对黑格尔劳动对象化理论的批判。他以对黑格尔自然观的考察作为出发点,进而批判黑格尔人的本质观念,并翻转了否定辩证法。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阐释了有关自然主义、人的本质、异化劳动、辩证法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完成了对黑格尔劳动对象化理论的超越。

关键词:劳动对象化; 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 黑格尔

黑格尔提出劳动对象化理论后,马克思立足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各国的现实境况,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对其理论进行了集中批判,在此基础上,又在相关领域提出新的阐释,从而完成了对黑格尔劳动对象化理论的超越。

一、黑格尔的劳动对象化理论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将劳动定义为采取行动“进行塑造”的活动,“对劳动者来说,对象具有独立性”,劳动将“与对象之间的否定关联转变为对象的形式,转变为一个持久不变的东西”^[1],这使对象获得独立存在的外观,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自在的世界转变为人的世界。由此,黑格尔的劳动对象化理论以否定辩证法为基础,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关系的观点集合。

(一) 否定辩证法基础上的劳动

在《伦理体系》中,黑格尔从主客体关系上对劳动进行界定,即劳动是对“客体的毁坏”“直觉的毁坏”^[2],这种“塑造性的毁坏”是包含着肯定性的否定,是赋予客体另一种形式以取代其原有状态的过程。因此,黑格尔将劳动视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3],认为劳动的异化与异化的扬弃是人的自我生成的必要前提。黑格尔辩证法作为正反合的思维过程,“自我确证”(即自我肯定、自我否定至自身回归)是关键环节^[4],通过自我在意识中对他的扬弃实现了肯定与否定的统一。

(二) 理念在自然界中的对象化

针对自然的本质问题,黑格尔认为“直观”

收稿日期:2024-07-05

作者简介:单璐,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

着的、“存在着的理念”是自然^[5]；关于自然的溯源问题，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表达为理念外化的结果，在《自然哲学》中通过理念的异化来指代自然的生成，在《精神哲学》中则阐述为“向自然的直接过渡”和“理念向外在的、孤立的定在的直接性的转变”^[6]。综上，黑格尔认为自然具有直接性、外在性、观念性、孤立性等性质，同时，他在《自然哲学》中提出将否定性作为自然界的本性——自然是“理念的否定东西”^[7]。

（三）理念在人类社会中的对象化

黑格尔哲学作为精神自身的展开，将自我意识作为主体。黑格尔指出自我意识在自身内部，已然将个体的自我进化成类，即类意识——“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8]。黑格尔用自我意识代替了人类社会中人的本质，人的异化了的对象就是绝对精神。黑格尔以主奴关系表征自我意识的双方，主体通过对象化将自己的本质力量赋予客体，同时也在对象化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自我确证和提升。这种自我意识的对象化过程超越了个体的局限，将个体的精神力量提升到普遍层面，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回归。通过劳动，自我意识能够将自身存在的价值赋予事物，从而实现自我意识的自由。

由此，黑格尔将人类社会中的交往建立在劳动基础之上，理性个体通过劳动这一过程与其他个体建立交往关系；同时突破了康德和费希特交往理念的抽象性，认为在劳动中，自我意识发展为实践理性，成为“德行”^[9]。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发生了角色转换，从自我意识的塑造者转变为自我意识同外部世界达成统一的中介，对象性的、现实的人是自身劳动的结果。

二、马克思对劳动对象化理论的批判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自然观的批判

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将自然的发展看作辩证发展的过程，但他指出这种自然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10]，并揭示了黑格尔将思维和主体（即有生命的人本身）分离的事实。在马克思看来，黑格

尔的抽象思维本身是无，“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只具有被扬弃的外在性意义”^[11]。马克思强调精神劳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物质劳动紧密相连、相互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2]，物质劳动的变革与发展，往往引发精神劳动的相应调整与革新。

针对黑格尔的抽象自然理念，马克思提出人化的自然观。他首先指出人化自然是人感性活动的自然，强调在市民社会中，人的感性需要具有社会性。马克思看到了劳动实践在人和自然之间发挥关键的中介作用，也明确了自然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3]。人通过实践与自然相互确证，两者形成辩证发展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业具有自然主义性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界为工人提供生活资料，并通过工业在实践上“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14]。同时，从人的主体性出发，人并非被动的存在，而是具有创造力的能动性存在；自然是工人劳动的对象，在人的劳动实践中不断获得属人的性质，被改造成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展现，使得社会具有人类的印记。人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物，通过劳动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整个自然界都是人类对象性活动的领域。在对象化过程中，人仅凭单独的个体形式无法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形成对象性的存在。因此，历史首先是人类的生产史、人通过劳动而诞生、自我实现的历史。人必然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和改造自身，因而人自身也是历史的产物。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人的本质观念的批判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将人的本质规定为“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抽象存在物^[15]，他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理解为绝对精神，并将其作为劳动

的主体，因而他的劳动辩证法只是绝对理念展现自身的环节，将劳动的对象化等同于克服自我意识的对象的过程。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在劳动对象化过程中是“感性、现实、生命”的冒充者，揭示了“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6]。而马克思认为意识是人的劳动的产物，因此劳动是比意识更为深刻的人的本质，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17]。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异化”的观点进行批判。黑格尔将人自身作为异化世界的尺度，认为“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18]，马克思认为，异化的主体仍是人本身，主体从自身的活动中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与主体相疏离相对立的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存在。因此，异化的实质是一种分离，人在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确证自身；同时，对象化的活动也蕴含着异化的可能性，排斥甚至与人相背离，否定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指出在劳动过程中，人如果离开了这个外在于自身的对象性存在，人也就是无。

（三）马克思对否定辩证法的批判

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否定辩证法的双重错误。其一，把人的思想作为异化了的世界的尺度，将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为，使人变成非对象性的存在物，不与现实对象发生关系，外化和对外化的扬弃实质都是在精神领域内的自我运动。其二，黑格尔“要求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19]的对象仅包含抽象的意识，因而异化的复归也仅停留在观念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虽然坚持了人的异化，但仍是“对自然界的直观加以抽象化的确证行动”^[20]。马克思认为，劳动的主体“人”应当是具有对象性的、现实的人，是依据一定的物质条件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是在既定

的历史条件下能动地展现自身本质力量的人。人的本质是在积极的活动中形成的。人改变对象世界，劳动使人的自由和普遍本质得到实现。

马克思认为，否定辩证法是头足倒置的唯心辩证法，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具有形而上学的内在性和抽象性。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异化机制的否定性并非外在地表现在与他者的对立中，而是自反地表现为向绝对理念的复归。马克思认为抽象的逻辑不具备历史性批判向度，也无法作为对外部世界的解释。因此，否定之否定运动应在批判资本逻辑、自觉表达客观世界变革的具体过程中得以运用，作为自身必要的组成部分与内在特质，构成返回自身的力量源泉，此时辩证法才真正立足于社会现实，并成为事物生命的真正动因和原则。

三、马克思对劳动对象化理论的超越

马克思将劳动对象化规定为“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21]和“劳动的实现”^[22]。在他看来，劳动的产品是劳动对象化的集中表现，人通过劳动创造对象世界，而对象世界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关于自然主义、人的本质、异化劳动、辩证法等一系列理论观点。

（一）人化自然观的发展

马克思阐释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关系，确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23]。其一，当共产主义取消了资本主义强加在人类身上的一切关系，自然真正能为人类掌握和服务，由此实现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最大的人道主义就是使得人类掌握并自由自觉地运用自然规律。其二，当人能够自觉运用规律去满足自己需要时，人类不会对自然造成危害，不会去逆向地使用自然规律，破坏自然，因而可以达成人和自然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人同自然界、人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分解；人和人之间也摆脱了恶性的竞

争关系，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辩证关系是三对关系的反映。其一，存在和本质之间矛盾的解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的存在和本质是分离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和本质统一于人自身，人成为自由的个体。其二，对象化和自我确证之间的和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通过劳动产生对象化的劳动产品，劳动产品不归生产者自己所有，而是由资本家代理，将劳动产品变为商品，劳动者的自我确认是以金钱的方式来体现的，劳动者本身无法实现自我确认。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不再用金钱来衡量价值，商品社会过渡到产品社会，私有财产被扬弃，劳动者通过劳动本身能够证明自我价值，实现自我确认。其三，自由和必然的和谐。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限制个人自由的必然性，同时这种必然性为人类所感知；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人可以自由运用自然规律达成个人发展目标，自然界的必然性成为人类自由性实现的基础和武器。

（二）劳动是人的对象化活动

马克思将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并阐明劳动是对象化活动的原因。其一，人作为主体本身，也是客观物质的、对象性的存在。人作为劳动的主体离不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存在，因而他的劳动必然是同自然界和社会发生联系的对象化的客观劳动。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从抽象的意识形式中解放出来，使其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对象化于世界之中。其二，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由于人具有意识，总是根据自身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生产和改造，而不是依靠自然的直接赐予，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交往。意识的广泛性引起生产范围的广泛性、生产目的的全面性，共同推进了人类劳动方式和劳动产品的多样性，这是人类劳动中客观存在的生产优越性。

在马克思看来，人正是在创造性地改造对象

世界的过程中，将自身生命力对象化，并通过参与共同事业确证自己是自觉的类存在物。“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24]，马克思没有抽象地假定一种人的形而上学的本质，而是对劳动的否定的、异化的形式进行溯源，发掘和把握劳动积极的、肯定的和原始的形式，进而发现在任何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绝对必要的。

（三）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现象是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种必然具有阶段性。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异化现象必然会被扬弃。而人的劳动的实现就是对象化，对象化劳动是人类有意识的对象性活动，必将贯穿社会历史的全过程。因此，马克思将对象化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异化则归属历史范畴。

基于对异化的理解，马克思在社会生产维度提出关于异化劳动的观点。从生产结果出发，首先是物的异化，即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马克思指出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感性世界。由于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劳动产品作为凝结的劳动，颠倒过来奴役劳动者，支配活劳动。这个过程是自相矛盾的，劳动者生产的对象越多，异己的力量越强，自身所占有的对象（生活资料）越少，进而受资本统治和劳动产品奴役的程度越深，由此形成物的世界增殖和人的世界贬值之间的异化关系。

异化还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即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自我异化。私有制使工人的劳动成为资本家追逐利益的工具。对于劳动者而言，劳动被单一化为谋生手段，是受动的过程，外在于自身，脱离了人的本质属性。这就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即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两个阶级间的对抗性关系。“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很自然地推论出了共产主义的‘当为性’”^[25]，他认为劳动者必须以劳动解放为基础，扬弃劳动对人的异

化状态。“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26]，马克思将私有财产作为劳动异化的表现，进一步明确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克服异化的途径是共产主义——建立一个克服一切不合理现象的社会，将“少数人的”变为“绝大多数人的”。

（四）辩证法从认识领域向实践领域的转变

马克思指出否定之否定正是生产实践的矛盾运动过程^[27]。其一，辩证否定运动的实质是生产劳动的历史。马克思认为，否定之否定是人通过生产劳动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而不是疏离了劳动的“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28]。

“劳动的异化及其扬弃正是为揭开‘真正人类历史’的序幕而进行准备的‘前史’”，“他把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归结为‘劳动异化的积极扬弃’”^[29]，将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发展基本走向的预示，并以此论证了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其二，辩证否定运动的主体是现实的、有目的的人。黑格尔的劳动主体是自我意识，所以他的“否定之否定”是对思想上的本质扬弃，无法触动现实生产生活中的对象。马克思肯定了人不是“片面的存在物”，而是“普遍的、无限的存在物”^[30]，历史的发展趋势遵循和体现了人有目的的生产劳动的历史过程。

由此，马克思翻转了否定辩证法，揭示了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在普遍意义上，劳动对象化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人的本质和力量支出、展开，使自然成为人的主体力量的外化，即人化的自然，这是主体至对象的否定。同时，人又占有和享受劳动产品，并通过劳动改变和发展自身，这是主体力量从对象回归主体的否定之否定。而在异化劳动中，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实现的，劳动产品对于主体的复归，不是主体对对象的占有，而是对主体的压迫和统治。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先刚,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25.
- [2] 吴鹏. 论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及其困境[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3): 13-19.
- [3][4][10][11][13][14][15][16][18][19][20][23][24][26][28][30]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98、93、114、115、89、86、99、264、100、97、115、231、103、77、111、306.
- [5] 黑格尔. 逻辑学[M]. 梁志学,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67-368.
- [6] 黑格尔. 精神哲学[M]. 杨祖陶,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3-24.
- [7] 李文汇, 林建成. 马克思对黑格尔自然观的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段著名论述的全面解读[J]. 中州学刊, 2013(6): 113-117.
- [8] 邓晓芒.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 第六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27.
- [9] 张东辉.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思想[J]. 哲学动态, 2023(9): 76-85.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2.
- [17] 李昕桐. 马克思主义“现实性”思想三原则解析[J]. 哲学动态, 2020(11): 23-31.
-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57.
- [22] 聂锦芳. 关于重新研究“巴黎手稿”的一个路线图[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3(3): 119-128.
- [25] 王南湜, 夏钊. 人是对象性活动: 马克思哲学本体论之第一原理[J]. 天津社会科学, 2019(1): 13-28.
- [27] 陈永杰, 谭晓婷. 论“否定性”概念的批判性重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 43-50.
- [29] 张一兵. 物化与异化: 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察——孙伯鍈《卢卡奇与马克思》研究[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3(1): 41-51.

责任编辑: 王天涯